

【论 文】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的利弊分析¹

刘显忠²

内容提要: 20 世纪 20 年代, 苏维埃政权为了赢得国内少数民族的支持, 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本土化”政策, 即民族化政策。“本土化”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 使各少数民族亲身感受到了苏维埃政权对他们的尊重, 也增强了他们对当局的信任, 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位。但“本土化”政策也导致了地方民族主义及对民族地区非本土民族(包括俄罗斯人)利益的损害或忽视等问题。

关键词: 苏联 民族政策 “本土化”

“本土化”政策, 是苏维埃政权在民族地区推行的以苏联的少数民族语言取代俄语的政策, 也是把俄罗斯族人从新成立的民族共和国中迁出的政策, 目的是纠正旧俄国推行的强制俄罗斯化政策, 以增强少数民族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 通过吸收当地居民参与地方管理的方式巩固民族边区的苏维埃政权。其基本思想是斯大林在 1923 年春天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斯大林提出:“为了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对其他民族的农民同样亲近的政权, 就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其他民族的农民所了解的政权, 它必须使用本族语言办事, 学校和政权机关必须由熟悉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组成。只有这些共和国的政权机关用本族语言说话和工作的時候, 苏维埃政权(直到最近还是俄罗斯的政权)才不仅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政权, 而且能够成为各民族的政权, 成为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所亲近的政权。”³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明确规定:“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区域的机关主要应由熟悉各该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当地人组成。颁布特别法令, 在为当地非俄罗斯民族居民和少数民族服务的一切国家机关和一切机构内, 保证使用本民族语言; 颁布法律, 对一切侵犯民族权利, 特别是少数民族权利的人, 用最严厉的革命手段予以追究和惩治。”⁴可见, 俄共(布)十二大实际上正式宣布“本土化”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方针。

“本土化”政策的积极成果

俄共(布)十二大后, 俄共(布)开始贯彻落实“本土化”政策。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所推行的“本土化”政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使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本土化”。十月革命前, 沙皇政府通过向民族边区的管理机关和行政机关安插俄罗斯人的方式对民族地区进行管理, 推行强制俄罗斯化政策。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后, 积极吸收当地民族居民参加党政机关的工作, 提高本土居民代表在各共和国机关中的比重。在 20 世纪 20 年代实行“本土化”之后, 少数民族成员在共产党员中间、在各个共和国党政机关中的比重都在明显上升。1922-1927 年, 共产党员中俄罗斯族人的比重从 72% 降到了 65%。⁵在乌克兰, 1920 年底乌克兰族人约占乌克兰总人口的 80%。1922 年 4 月在乌克兰共产党(布)

¹ 本文刊载于《俄罗斯学刊》2013 年第 1 期, 第 79-83 页。

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研究员。

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 民族出版社, 1990 年, 第 231 页。

⁴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第 289 页。

⁵ Капеллер.А.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275.

中乌克兰族人占 23.3%，俄罗斯族人和犹太人的比重相应地为 53.6%和 13.6%。¹当时乌克兰族人在乌克兰政府机关中的比重不超过 35%。²从 1922 年到 1932 年，乌克兰族人和白俄罗斯族人在他们各自共和国党组织中的比重分别从 24%和 21%增至 59%和 60%。1932 年在中亚各民族共和国，本民族成员也已经占了他们所在共和国党组织成员的一半以上。³1924 年，乌克兰族人在乌克兰的中央和省级机关中占 39.9%；在外高加索，当地民族代表在中央及省级机关中占 54.3%，其中：格鲁吉亚人占 29%以上，亚美尼亚人占 22.5%，操突厥语的民族（阿塞拜疆的主要居民）占 1.5%。在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级别机关中土库曼族人占 10%，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级别机关中哈萨克族人占 8.3%。1925 年，在白俄罗斯的中央机关中有 42.6%的工作人员是白俄罗斯族。在巴什基尔中央执行委员会巴什基尔族人占 50.5%，在雅库特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雅库特族人占 16%。到 1930 年前夕，“本土”民族在各自共和国级的机关中所占比例如下：在白俄罗斯占 59.4%，乌克兰 36.2%，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29.94%，哈萨克斯坦 12.7%，鞑靼斯坦 33.8%，阿塞拜疆 36.79%，亚美尼亚 93.53%，格鲁吉亚 74.6%。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亚实行了“本土化”，但由于当地民族中有文化的干部不足，致使当地民族的人在国家管理机关中仍处于少数，而俄罗斯族人在其中占多数的状况没有多大改变。

另一方面就是大量建立民族语学校、推广使用民族语言。在帝俄时期，沙皇政府推行强制俄罗斯化政策，境内很多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教育方面都受到诸多限制。就乌克兰族人来讲，1906 年俄国教育部同意把乌克兰语作为辅助语言以“解释学生不理解的内容”，但 1907 年这一决定又被收回。1908 年俄国政府拒绝了一些杜马代表提交的关于乌克兰族人的初等教育使用母语的法案。1911 年政府会议还强调，由于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旧称）和白俄罗斯族人不能列为异族人，他们的教育“应当用俄语进行”。1914 年 2 月俄国内务部还反对纪念著名的乌克兰诗人 Т. Г. 舍甫琴柯诞辰 100 周年。对犹太人的文化限制更为严格，1908 年 8 月俄国大臣会议严格规定了犹太人进入高等学校的百分比：在各个首府城市是 3%，在犹太人定居区以外的其他城市是 5%，在犹太人定居区是 10%。⁵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不仅废除了沙俄时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限制，而且还在各地普遍建立了民族语学校，推广、普及少数民族母语，使少数民族学生都享受到了母语教育，满足了其境内各少数民族多年来一直争取但始终没能实现的要求。20 世纪 20 年代，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小学共使用 68 种语言进行教学。比如，巴什基尔的小学用巴什基尔语、俄语、鞑靼语、乌克兰语、楚瓦什语、马里语教学；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小学用鞑靼语、俄语、楚瓦什语、马里语、乌德穆尔特语、莫尔多瓦语、乌克兰语、德语教学；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小学用俄语、鞑靼语、乌克兰语、德语、犹太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保加利亚语、爱沙尼亚语、捷克语、波兰语、意大利语教学；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小学用阿瓦尔语、俄语、拉克语、列兹根语、奥塞梯语、切尔克斯语、达尔金语、亚美尼亚语、库梅克语、德语教学。当时不仅在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建立了民族语学校，而且在俄罗斯族人（聚居或为主要居民）的地区也有类似的学校。比如，在列宁格勒州就有用俄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波兰语、拉脱维亚语、犹太语、鞑靼语、乌克兰语、德语和涅涅茨语进行教学的各种小学；在莫斯科州有用俄语、乌克兰语、拉脱维亚语、鞑靼语、犹太语、德语、莫尔多瓦语、卡

¹ Лановик Б.Д. Лазарович М.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Київ, 2006, с. 371.

²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http://revolution.allbest.ru/languages/00001301_0.html.

³ Капеллер А.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275.

⁴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1920-е—1930-е годы).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3, с.134. 按：在乌克兰出版的教学参考资料中，1923—1927 年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乌克兰人的数量从 35%上升到 54%。见 Лановик Б.Д. Лазарович М.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Київ, 2006, с. 374.

⁵ Дякин В.С.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царизма(начало XX).См.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11-12, с.48.

累利阿语、茨冈语进行教学的各种小学；在中央黑土州有用俄语、乌克兰语、德语、鞑靼语、犹太语进行教学的学校；在伊万诺沃州有用俄语、白俄罗斯语、鞑靼语进行教学的学校。¹ 当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甚至还允许突厥斯坦的地方当局开办教会学校。还把由父母付酬请专门教师在课余时间苏维埃学校的教室里传授教义作为一项临时措施。²到1927年，有90%的白俄罗斯族小学生、94%的吉尔吉斯族小学生和几乎96%的鞑靼族小学生都在各自的共和国使用母语教学的小学学习。当时也为那些没有自己共和国的民族建立了这样的学校。比如在乌克兰，有一半的犹太人都在犹太语学校受教育。³1923年苏联有411所波兰语学校，其中685名教师，16086名学生。1924年8月还提出建立白俄罗斯族天主教徒和乌克兰族天主教徒的波兰语学校问题。1925年9月17日政治局根据边界地区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扩大民族学校网”问题。⁴

当时，除大量建民族语学校普及民族语言外，苏联政府还要求在公文处理、教育、报刊出版等领域使用民族语言。例如，在外高加索，1925年大部分中央机关都用当地语言处理公文；在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公文都是用白俄罗斯语写成的；在乌克兰各个省和民族区的机关，公文都使用乌克兰语。1922年乌克兰只有20%的公文采用乌克兰语，1927年这一指标达到了70%。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乌克兰的工业区改用乌克兰语的进程进行得比较缓慢。但乌克兰语最终还是成了乌克兰的主要交流语言，在官方公文和教育、报刊出版等领域被广泛使用。1929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80%的中小学、60%以上的中等技术学校及30%的高等专科院校用乌克兰语教学。乌克兰语的报刊和出版机构的数量在扩大：一半以上的书籍、报纸和杂志都开始用乌克兰语出版。到1930年前夕，乌克兰语学校和俄语学校的比例是10:1，2/3的中等技术学校和1/3的高校都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⁶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还在为无文字的语言创造文字做了大量工作。到1930年代末，46个无文字的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文字。

这些措施的目的不仅是要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而且也是要在其基础上普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土化”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各少数民族亲身感到了苏维埃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也增强了他们对当局的信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位。对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就是一些西方学者及持不同政见者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称二十年代为“黄金时代”。⁷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伊凡·麦斯特连柯也指出：“这些年代里出现了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建设的空前的繁荣以及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民族复兴。民族共和国和州的中小学改用当地居民的本族语言教学。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也改用本地语言教学，虽然到三十年代初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前并不是每所大学都如此。加盟共和国的所有报刊和图书出版社也都改用本地民族文字出版。人们认为，供俄罗斯居民阅读的俄文报刊和书籍可由莫斯科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其他中心供应。绝大多数剧院也改用本地语言演出。在两个斯拉夫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由于本地语言和俄语相近，俄罗斯居民特别是工人和小职员，把自己的子女大批送进民族学校，认为这样更有前途。在某些县城和省城，人们在街上都讲起了本族语言，而革命前，本族语言被更‘文明的’俄语所排挤。总之，看来民族区域自治如能再继续十年，非俄罗斯共和国和州的民族问题就会完全解决而有利于当地居

¹ Бурмистрова Т.Ю. Зерна и плевелы: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84).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3, с.41-42.

² Бурмистрова Т.Ю. Зерна и плевелы: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84).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3, с.47.

³ Капеллер А.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276.

⁴ Костошко И.И. Поль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меньшинство в СССР (1920-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2001, с.121.

⁵ Лановик Б.Д. Лазарович М.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Київ, 2006, с. 374.

⁶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http://revolution.allbest.ru/languages/00001301_0.html

⁷ Капеллер А.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274.

民。”¹

“本土化”政策的负面效应

在肯定“本土化”政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相反在推行“本土化”政策的过程中，解决了革命前在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本土化”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对非本土民族（包括俄罗斯人）利益的损害或忽视。奥尔忠尼启则在1923年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各个共和国忽视非本土民族的事实。根据1923年的资料，当时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中，没有一位人民委员是出身于俄罗斯民族或亚美尼亚民族，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梯弗里斯（1936年改称第比利斯），第二届梯弗里斯苏维埃的成员中，格鲁吉亚族人占43%（尽管他们在格鲁吉亚首都居民总人口中仅占25%），亚美尼亚族人占17%（在梯弗里斯的总人口中占1/3以上）。²在一些民族地区俄罗斯族人成了新的“少数民族”，其利益也受到了损害。1923年8月一份提交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分析报告就指出：“在苏联的很多构成体中，俄罗斯族居民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而原住居民获益。”³ 戈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代表在一份呼吁书中说：“俄罗斯族居民的生活状况令人难以忍受，正在普遍走向破产，被迫搬出戈尔共和国……对俄罗斯族人经常不断的掠夺和采取的强制措施完全破坏了民族地区的经济。”⁴ 有些卡尔梅克的俄罗斯族人当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应当赋予我们与卡尔梅克人同样的权利。”⁵ 忽视俄罗斯族人利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除俄罗斯联邦外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党组织。在1925年12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俄共（布）改称联共（布）后，因党的名称的改变在党的高层出现了建立俄罗斯共产党问题的讨论。当时奥尔忠尼启则提出组建俄罗斯共产党的建议，加里宁表示支持，伏罗希洛夫也认为在按国家的名称更改党的名称的情况下，“从逻辑上讲必须组建俄罗斯共产党，因为在苏联中有俄罗斯联邦。”但斯大林反对这一要求，认为建立特殊的俄罗斯共产党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导致党以联邦制的形式分裂”。⁶

其次，“本土化”政策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而民族主义情绪又导致了中央以地方民族主义为借口采取不正常的形式进行反民族倾向主义的斗争。如1928年初，在亚美尼亚揭露了所谓的“独特性主张者”集团，他们被指控过分强调各共和国的民族独特性。在乌兹别克克斯坦，突厥斯坦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У. 霍贾耶夫（У. Ходжаев）、黑德拉里耶夫（Хыдыралиев）等被指控为“民族右倾主义”，他们被指控包庇巴依（中亚、新疆地区的富牧主、富地主）、原沙皇官员和那些推行民族主义路线及反对中央派来的干部的人。在哈萨克斯坦，1926年尖锐地批判了共和国的工作人员С. 萨德沃卡索夫（С. Садвокасов）、С. 哈贾诺夫（С. Хаджанов）、Ж. 蒙巴耶夫（Ж. Мунбаев）的“民族倾向主义”集团支持阿乌尔（高加索、中亚等地的乡村）的剥削分子，阻挠工业的发展，力图使哈萨克斯坦与其他共和国分开等。1926年共和国著名的活动家Т. 雷斯库洛夫（Т. Рыскулов）被控犯有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鞑靼布尔什维克的杰出代表、民族人

¹ 伊凡·麦斯特连柯著、林钢译、船甲校：《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

²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 (1920-е—1930-е годы).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6, №3, с.134.

³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 (1920-е—1930-е годы).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6, №3, с.131.

⁴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 (1920-е—1930-е годы).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6, №3, с.131—132.

⁵ 同上，第132页。

⁶ Вдовин А.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30-х годов(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корнях кризиса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См.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8. история .1992, №4, с .26.

民委员部委员会成员М.-Х. 苏丹-加利耶夫(М.-Х. Султан-Галиев)于1923年被开除出党,而后在鞑靼对“苏丹-加利耶夫分子”进行了长时间的搜寻。1928年捏造了新的作为国际帝国主义和一系列外国总部的代理机构的“苏丹-加利耶夫集团”案(苏丹-加利耶夫本人在1940年被枪决)。当时对民族主义者进行的没有充分根据的镇压使各个民族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对这种结果,苏丹-加利耶夫实际上已经预料到了,他在一次会议上曾指出,大国沙文主义者“……将会以巴什基尔民族主义为借口,打击巴什基尔共产党人……同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有可能采取不正常的形式”¹。

第三,“本土化”政策主要是要消除沙俄时期推行的违背少数民族意愿的强制俄罗斯化的影响,但在推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同样表现出了不顾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特点,违反少数民族意愿的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性特点。比如,在白俄罗斯,在苏维埃选举时,同俄罗斯交界地区的几个村的居民出于现实的考虑,做出了“在学校不实行白俄罗斯化”的决议,附在了给代表的委托书后面,但未被接受。1927年斯摩棱斯克州有些犹太村苏维埃主席反对把公文翻译成犹太语,认为这办不到。²在乌克兰,当时作出了在1926年1月1日前结束国家机关和企业的“乌克兰化”的决议,但乌克兰当时的领导人没有表现出特殊的热情,结果,1925年4月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埃曼努尔·克维林(Эммануил Квиринг)被免职,代之以拉·卡冈诺维奇(Л. Каганович)。卡冈诺维奇任命原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舒姆斯基(А. Шумский)为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狂热地推行党和政府的决议,开始了全面乌克兰化进程。在敖德萨,乌克兰族学生不到1/3,但所有的学校也都“乌克兰化”。“乌克兰化”政策在当地的乌克兰民众中并没有得到支持。不仅在学校和其他学术机构,而且在机关和日常生活中乌克兰语都是以强制的革命方式和“斯达汉诺夫”的速度推行的。有几年在基辅曾禁止所有的俄语出版物出版,而一些不太懂乌克兰语的年老职员、甚至一些流利地掌握乌克兰语口语的乌克兰族人都被残酷无情地从各个机关中赶了出来。乌克兰“意识”成了担任各种职位的主要的、唯一的标准。当时各个机关和企业的职员,包括清洁工和管院子的人都要“乌克兰化”。不想“乌克兰化”或乌克兰语考试没通过的人被免职,无权领取失业补助金,并持有黑籍证(帝俄时代发给革命者的证件)。³

结 论

从苏联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民族政策上不能走极端,不能迷信行政力量,应该尊重人民自己的选择。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不能按民族成分来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培养公民平等意识是十分重要的。苏联20年代推行的“本土化”政策意在纠正沙俄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但是矫枉过正,同样也带来了对国家许多不利影响。正如苏联解体后曾担任乌克兰总统的Л. 库奇马所总结的:“卡冈诺维奇不懂乌克兰语,但以突击性的方式学会了乌克兰语,这给全体工作人员树立了榜样。他大量吸收乌克兰人入党,把苏维埃工作人员中乌克兰人的比重提高了50%,很快,共和国大部分的书、杂志和报纸都用乌克兰语文出版。一些著名的文化和艺术学者、作家信任共产党人,从国外返回乌克兰。乌克兰语在一些指挥员学校和红军的一些部门里推行。截至1927年,乌克兰的大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和四分之一以上的高等专科学校都改用乌克兰语教学,这只是开始。1930年,用乌克兰语教学的学校数目为85%。无论对1920年代发生的情况抱何态度,应当承认,如果不是当时实行学校的乌克兰化,也许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独立。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培养了千百万乌克兰人,正如时代所表明的,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成了乌克兰的

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а перекрестке мнений.20-е год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 1992, с.200.

²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1920-е—1930-е годы).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3, с.135.

³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http://revolution.allbest.ru/languages/00001301_0.html.

乌克兰因素最重要和最无法破坏的要素。”¹ 苏联的解体表明，苏共的民族政策是不成功的，苏联并没有找到如何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保障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繁荣之路，苏联的教训值得研究和总结。

【论 文】

20 世纪 20-30 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²的实践³

刘显忠⁴

内容提要：20 世纪 20-30 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表现为乌克兰化。“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贯彻落实的。强制乌克兰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党员及苏维埃机关中本土民族的成分增加，乌克兰语得到了推广，促进了乌克兰民族教育的发展。但乌克兰的“本土化”是与当时苏联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全国中央集权化的加强，民族关系领域的宽松政策也难以以为继，导致了对乌克兰化政策拥护者及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打压和“清洗”，乌克兰化政策收缩，乌克兰重又回到了两种语言并存的状态。

关键词：苏联民族政策 本土化 乌克兰化

“本土化（Коренизация）”政策，是 1920 年代及 1930 年代初苏维埃政权处理苏联民族问题的政策。其目的是纠正旧俄国推行的强制俄罗斯化政策在少数民族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增强少数民族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通过吸引当地居民参与地方管理的方式巩固民族边区的苏维埃政权。民族自决权理论和《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是“本土化”的意识形态基础。

1920 年 10 月 10 日，斯大林第一次正式宣布了苏维埃的“本土化”政策的基本思想：“必须使边疆地区的一切苏维埃机关，即法院、行政机关、经济机关、直接政权机关（以及党的机关）尽可能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当地人组成。”⁵在 1923 年春天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本土化”政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方针最后成型。斯大林在大会上强调各民族的友好关系，指出：“为了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对其他民族的农民同样亲近的政权，就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其他民族的农民所了解的政权，它必须使用本族语言办事，学校和政权机关必须由熟悉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组成。只有这些共和国的政权机关用本族语言说话和工作的時候，苏维埃政权（直到最近还是俄罗斯的政权）才不仅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政权，而且能够成为各民族的政权，成为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所亲近的政权。”⁶会上谴责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区域的机关主要应由熟悉各该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当地人组成。颁布特别法令，在为当地非俄罗斯民族居民和少数民族服务的一切国家机

¹ Кучма Л.Д. Украина—не Россия. Москва, 2003, с.19. Медведев Р. Расколота Украина. Москва,

² 乌克兰是个新国家，它作为一个统一独立的主权国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本文所说的乌克兰，是 1939 年前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还不包括面积近 15 万平方公里的西乌克兰。

³ 本文刊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⁴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 年，第 149—150 页。

⁶ 同上，第 231 页。

关和一切机构内，保证使用本民族语言；颁布法律，对一切侵犯民族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权利的人，用最严厉的革命手段予以追究和惩治。”¹俄共（布）十二大后，苏联各个民族地区开始贯彻落实“本土化”政策。“本土化”在乌克兰的推行被称为“乌克兰化”。1920—1930年代乌克兰“本土化”政策的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本土化”政策的情况。目前，我国国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回顾这个问题，对认识独立后的乌克兰所进行的乌克兰化无疑是有意义的。本文试就1920年代苏联的“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的实践及效果进行分析，以加深对苏联1920年代民族政策的认识。

“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的贯彻落实

乌克兰的“本土化”即乌克兰化，是俄国革命的一项成果，早在1919年12月2日的俄共（布）第八次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中就指出：“乌克兰的俄国共产党员，应切实实现劳动群众用民族语言进行学习，及在一切苏维埃机关用民族语言交谈的权利。……苏维埃一切机关里要有足够数量熟悉乌克兰语言的工作人员，今后还要使一切工作人员能以乌克兰语言交谈。”²1920年春，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成立了乌克兰化的专门委员会。1920年4月7日，曾是“斗争派”成员、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格林科把自己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呈送给乌共（布）中央书记柯秀尔。9月，另一位曾经的“斗争派”领袖、1920年任《消息报》编辑的布拉基特内也向乌共（布）中央递交了类似的报告。在报告中指出：“党和苏维埃机关乌克兰化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在公文中使用乌克兰语、落实关于乌克兰语平等的决议问题，要列到乌克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日程上”，他要求在动员之后召回来自各地（其中包括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精通乌克兰语和乌克兰工作条件的工作人员，“以不懂乌克兰语的来自乌克兰的有同等价值的工作人员取代被动员走的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应当采取措施教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乌克兰语，以命令的方式确定他们应该学会乌克兰语的期限。³

1923年4月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本土化”方针后，在当月举行的乌共（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就宣布了“乌克兰化”政策。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立即通过法令确认了这一政策。1923年5月25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按苏维埃的方式落实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指示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落实国家机关及教育机关中与确立乌克兰语和俄语之间事实上的平等相关联的各项措施；为此目的制订相关的法令和决议。委员会的主席是拉柯夫斯基，委员会成员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林科、副教育人民委员里亚波、人民委员会秘书佐林、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索洛杜布、小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等。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5月30日举行。会议内容为一些笼统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给利益相关的一些部门下达一系列任务，准备有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职员的数量、其中精通乌克兰语者的比例、各级学校学生的数量及学生和教师中精通乌克兰语者数量的材料。⁴

6月1日，在乌克兰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乌共（布）中央书记克维林做了关于落实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报告，通过了名为《乌克兰语的推广》的决议。在决议中制订了一系列旨在科学论证乌克兰化的一系列措施。决定加快乌克兰语教学词典的出版。责成

¹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89页。

²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³ *Ненароков А.П.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ервых лет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См.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0,№2.с.4.*

⁴ 同上，第9页。

教育人民委员仔细考察，以便使本土的基辅—波尔塔瓦方言作为词典的基础。在承认哈尔科夫还将长期做共和国首都的同时，责成拉柯夫斯基和扎通斯基仔细考虑乌克兰文化中心的发展形式，认为把科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放在首都是比较合理的。对出版政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依靠专项补贴增加乌克兰语出版物的决议中强调，不允许同时缩减俄语书籍的出版。责成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尽快做出降低乌克兰语出版物价格的决议。¹

1923年7月3日的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会议审议了拉柯夫斯基起草的《关于保证语言的真正平等措施》的法令草案。在讨论之后，增补了绪论部分，在绪论中确认：“由于乌克兰学校和乌克兰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缺少足够的人员，只是形式上承认乌克兰最常见的两种语言（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平等，实际上正如经验所表明的，导致了俄语的优势地位。”文件的最终名称是《保证语言平等和协助乌克兰语发展的措施》。1923年8月1日该文件被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²Г.И.彼得罗夫斯基、拉柯夫斯基签署了法令。7月9日和10日，有拉柯夫斯基出席的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委员会又审议了把公文翻译成乌克兰语的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中央和省级权力机关中的公文，作出决定，公文应主要用乌克兰语写。同时在通过的决议中专门附带指出：“现在俄语不再是压迫阶级的语言，相反成了有大量人民群众的苏联交往的工具。”所以，“在加大乌克兰语的推广力度的同时，不仅国家公职人员，而且广大民众掌握俄语也是必要的。”至于各个地区的公文，应该用该地区大多数居民的语言。共和国的各种法律文件要按令用乌克兰语和俄语颁布。在各级苏维埃会议上每个参加者可以用任何语言发言。³但一批人民委员，共13人在报告（已经致函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丘巴尔）中要求做出这样的决议：“通晓乌克兰语的人民委员会所有成员，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必须说乌克兰语。”报告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韦托什金起草，签名的有副教育人民委员里亚波、劳动人民委员洛巴切夫、副内务人民委员切尔柳恰克维奇等。交通人民委员的全权代表的副手马利科夫要求表述准确：代替“必须说”而用“建议说”。只有农业人民委员克利缅科表达了特殊的见解：“不应当做出这样的决议，很清楚，每个人都有权用自己掌握的语言说话。”⁴

1923年4月—1925年4月这个时期被称为“法令方面的乌克兰化”时期。⁵当时尽管为落实1923年8月1日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而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如规定从1923年8月1日起禁止接收不能同时掌握乌克兰和俄语两门语言的人进国家机关工作；已经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如果在1924年8月1日前没有学会乌克兰语要被免职。⁶但当时推行这一计划的阻力很大。而且最大的阻力来自党内，首先是来自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因为在国家公职人员中，47%的无党人士很好地掌握乌克兰语，而党员中很好地掌握乌克兰语的只占18.1%。乌共中央的结论是：管理人员不认为是“严肃的政策”，对它持讥讽的态度，这也导致了对这一政策的破坏。人们甚至在他们精通乌克兰语的情况下也更喜欢说俄语。乌克兰化的检查员曾通报说，当他突然出现在一个机关进行检查时，在没料到他们面前站着检查员之前，那里的所有人都说俄语，只是在知道了之后立马改为流利的乌克兰语。鉴于这种情况，1924年3月的乌共中央全会和5月的党的代表会议都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要求全体党员学会乌克兰语。但这些决议没有取得任何明显效果。⁷乌克兰化培训班结业学员只占参加培训学员的11—15%。全面乌克兰化的最后日期也一

¹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0,№2.с.9.

²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0,№2.с.9.

³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0,№2.с.10.

⁴ 同上。

⁵ Мартин Т. Импери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ции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СССР.1923—1939.Москва, 2011, с.115.

⁶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117页。

⁷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118页。

拖再拖：起初是从 1924 年 8 月 1 日到 1925 年 8 月 1 日，然后改为 1926 年 1 月 1 日。¹

1923—1924 年的乌克兰化进展缓慢，与当时乌克兰最高领导人对这一政策的态度密切相关。当时的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克维林对乌克兰化态度消极。他在 1918 年甚至曾主张顿涅茨克和克里沃罗格州脱离乌克兰。在 1923 年后他尽管支持乌克兰化，但也不是毫无保留。他多次表示对乌克兰化的担心，担心“共产党”的乌克兰化有可能转变成“彼得留拉”的乌克兰化。² 当时的乌共（布）中央第二书记 Д. 3. 列别德也反对实行乌克兰化，而要让两种文化——乌克兰文化和俄罗斯文化自由地进行竞争。哪种胜利，哪种就是共和国的主要文化。他在文章中指出：“提出使党亦即使工人阶级积极乌克兰化（不把这一工作转到工人阶级身上，不能使党乌克兰化）的任务，对文化进步的利益来说是一项反动的措施，因为在城乡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关系的当前情况下，民族化即在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人为地推广乌克兰语，就是坚持低下的乡村文化的观点。”³

也正是由于克维林对乌克兰化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1925 年 4 月他被免去第一书记之职，代之以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卡冈诺维奇。

卡冈诺维奇上任后，乌共（布）中央全会通过紧急程序于 1925 年 4 月成立了乌克兰化委员会。4 月 30 日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仿效这个决议，成立了由丘巴尔任主席的苏维埃机关的乌克兰化全乌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一个令人生畏的《苏维埃机关立即进行全面乌克兰化的措施》的决议。卡冈诺维奇与时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的亚历山大·舒姆斯基，开始以官僚的方式狂热地落实党和政府的决议。他吸取前任的教训，为了贯彻落实乌克兰化政策，在三个方面采取了新举措：一是党直接主持乌克兰化工作，首先使党全面乌克兰化。规定党的主要出版物，其中包括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都用乌克兰语出版，而此前《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用乌克兰语出版，而党的中央机关报《共产党人》用俄语出版。党的中央机关也像党的基层机关一样所有的公文都用乌克兰语，会议要使用乌克兰语，党校的教学也要转成乌克兰语，每个党员，包括普通工人都要学乌克兰语。这些要求也推广到了共青团。二是对乌克兰化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要求每个乌克兰州和每个城市成立乌克兰化的地方党委，各个地方的乌克兰化党委定期汇报情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也成立了自己的乌克兰化委员会，监督并搜集来自各乌克兰化委员会的信息。三是强调强制的必要性。⁴在 1925 年 4 月的决议中指出，直到现在进行的只是“与农村紧密相关的苏维埃机关的自然的、公式化的乌克兰化，以及小学的乌克兰化。”今后需要采用强制措施（“进逼”）。正如后来乌共政治局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夸奖卡冈诺维奇强制推行乌克兰化时所说的：“乌克兰以前的任何一位政治书记在推行乌克兰化时都没有采取如此强有力的进逼。”⁵当时的“进逼”不是逮捕，主要是免职威胁。当时不仅在学校和其他学术机构，而且在机关和日常生活中乌克兰语都是以强制的革命方式和“斯达汉诺夫”的速度推广的。

1927 年接替舒姆斯基的斯克雷普尼克，是列宁的老战友，也以契卡的狂热和激情推行“本土化”。在接受巴黎的《乌克兰新闻》采访时，斯克雷普尼克谈到乌克兰化时曾指出：“乌克兰是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独立成员。乌克兰化已经推行，今后还要以最坚决的方式推行……对此不理解或不愿意理解的人不可能不被政府视为反革命者及苏维埃政权自觉或不自觉的敌人。”⁶在那个时期，由于乌克兰化实际依靠的仅仅是有共产主义取向的乌克兰知识分子，普通党员对乌克兰化热情不高，因此，有几年在基辅曾禁止所有的俄语出版物出版，而一些不太懂乌克兰语口语

¹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 120 页。

²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 119 页。

³ 伊凡·麦斯特连柯著：《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5 页。

⁴ 详见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 122—124 页。

⁵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 124 页。

⁶ <http://bratyslaviane.narod.ru/2006/2/i2-06-3-r.html>

的乌克兰族人都被残酷无情地从各个机关中赶了出来。乌克兰“意识”成了担任各种职位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乌克兰“本土化”政策取得的成绩

20世纪20—30年代，在乌克兰以强制的革命方式推行的乌克兰化政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首先，本土民族的党员人数大增。乌克兰从1924年开始大规模招收当地民族的代表入党。1924年乌共（布）共有570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其中45%是俄罗斯族人，33%是乌克兰族人，14%是犹太人。¹到1930年初，乌克兰族人在27.1万乌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中的比重提高到了53%。1925年乌克兰族人在乌共（布）中央的代表人数不超过25%，而1930年达到了43%。不过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党中央领导人只推荐非乌克兰族人担任，这一时期先后担任该职务的分别是德意志族人克维林、犹太人卡冈诺维奇、波兰族人柯秀尔。²

其次，乌克兰苏维埃机关中乌克兰本土民族的人比重增大。推行“本土化”政策之前，乌克兰的苏维埃机关中主要是非乌克兰族人。根据1923年的统计调查，当时乌克兰11826名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中只有797人宣称懂乌克兰语。苏维埃机关中乌克兰人的比重不超过35%。在领导机构中乌克兰族人的比重更小。人民委员部的主要职员，犹太人占40%，俄罗斯族人占到37%，乌克兰族人只占14%。而1927年乌克兰苏维埃机关职员中乌克兰族的比重达到了54%。³

第三，乌克兰语得到了广泛推广，促进了乌克兰民族教育的发展。如果说1922年只有20%的公文使用的是乌克兰语，那么，1927年则达到了70%。如果说1917年革命前东乌克兰基本上没有乌克兰语学校，那么1920年代末97%的乌克兰族的孩子都能用乌克兰语学习。⁴1931年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宣布，90%的高等专科学校和80%的中等技术学校都用乌克兰语教学了。⁵这个结论也许过于乐观。因为技术类高校对乌克兰化抵制最为强烈。教育人民委员的工作重点也主要是那里。1931年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乌克兰技术类高校（51.21%）都实现了用乌克兰语教学。⁶在敖德萨，乌克兰族学生不到1/3，所有学校也都乌克兰化了。主要的图书、杂志和报纸都开始用乌克兰语出版。1926年前乌克兰语报纸的数量增加到了60%，1933年则达到了89%。⁷1930年1月的中央决议规定，专业性的学术和技术杂志逐渐乌克兰化。1930年6月84.8%的杂志（328种中的278种）都用乌克兰语出版，其余的很多都是用犹太语、波兰语、德语等民族语言出版。乌克兰语图书的数量，1927-1928年占乌克兰出版图书总数的54%，1930年则占到了乌克兰出版图书总量的80%。⁸不过，出版物数量上的这种优势根本不能保证读者人数的优势，这主要是中央出版物的巨大影响。尽管乌克兰当局努力阻止，但大多数工人依旧订阅全联盟的报纸。斯克雷普尼克本人在1929年就曾抱怨说，乌克兰出售的书籍，只有15%是用乌克兰语出版的。而其他的85%是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语书籍。⁹剧院、无线电广播、电影制片厂都改用乌克兰语。在乌克兰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俄罗斯剧院了。根据斯克雷普尼克的动议，民族语言甚至在指挥学校及一些红军部队中使用。

¹ Кульчицкий С. Курс—украинизация. См. Родина.1999,№8,с.109.

² Под ред.Смолия В.А.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Москва,2008,с.627.

³ 同上，第626—627页。

⁴ Лановик Б.Д.,Лазарович М.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Навч. Посіб. Київ, 2006,с.374. 同上，第374页。

⁵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第155页。

⁶ Мартин Т.前揭书的第155页。

⁷ Лановик Б.Д.,Лазарович М.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Навч. Посіб. Київ, 2006,с.374.

⁸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153—154页。

⁹ Мартин Т.前揭书的第154页。

第四，在乌克兰所进行的“本土化”，也即乌克兰化，促进了乌克兰民族教育的发展。因为在推行“本土化”政策的过程中也展开了所谓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消除文盲。1923年在乌克兰成立“扫盲”协会。“扫盲”协会由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ВУЦИК)主席彼得罗夫斯基领导。由于积极的教育运动，到1927年，共和国有200万人学会了读写。1920年代末，不识字的人数从占成年居民的76%缩减到43%。1930年代末，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文盲了。¹乌克兰高校的数量也从1914—1915学年的19所增加到1938—1939年的129所。而大学生的数量也相应地从1914—1915学年的2.7万人上升到1938—1939学年的12.4万人。²

尽管当时推广乌克兰语是在民众热情不高的情况下强制实行的，不过现在看来，正是20—30年代的大规模乌克兰化运动为乌克兰保留了民族基因，甚至可以说为90年代的独立做了某种准备。正如曾担任乌克兰总统的Л.库奇马所说的：“无论对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情况持何种态度，应当承认，如果不是当时实行学校的‘乌克兰化’，也许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独立。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培养了千百万乌克兰人，正如时代所表明的，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成了乌克兰因素中最重要和最无法破坏的要素。”³

对“民族主义倾向”的打击及乌克兰“本土化”政策的最后结局

20世纪20—30年代乌克兰的“本土化”政策，是与新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就本质而言是新经济政策在民族关系领域的具体体现。用当今俄国一些学者的话说就是“民族的新经济政策”⁴。它的贯彻落实也像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一样，是与打击“民族主义倾向”相伴随的。按历史学家索科洛夫的说法，当时中央在推行“本土化”的同时，极力要“控制”住这些地方领导人，不允许他们有过多独立性，对“民族倾向分子”进行无情镇压。⁵卡冈诺维奇在大力推行乌克兰化的同时，就经常提醒各级党的机关，在乌克兰化的过程中思想斗争不会停止，而且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反苏文化的发展速度似乎常常会超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苏维埃文化。所以在推行乌克兰化的过程中，卡冈诺维奇借口与似乎威胁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整体统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斗争，在20年代下半期也开始了对乌克兰化的积极拥护者的打压和迫害。限制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是当时的常用手法。

最早的受害者就是积极推行乌克兰化的舒姆斯基和著名的乌克兰作家、政治活动家、1919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尼古拉·赫维列维。卡冈诺维奇与舒姆斯基之间的分歧，出现在1926年初乌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如何在异常顺利的强制乌克兰化运动之后更好地继续乌克兰化问题之时。在3月19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卡冈诺维奇宣布，党不应当“使无产阶级强制乌克兰化”。这本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统理论。但舒姆斯基感觉提出这个口号是卡冈诺维奇自己的立场不坚决。结果在3月31日政治局关于中央机关报《共产党人》乌克兰化的第二次会议上，舒姆斯基尖锐地批评了卡冈诺维奇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指责他们乌克兰化的速度过慢。舒姆斯基丢掉了卡冈诺维奇所说的“强制乌克兰化”中的“强制”这个关键词，指责卡冈诺维奇说党不应当使无产阶级乌克兰化。其他政治局成员也为卡冈诺维奇辩护，说他没说过这样的话。盛怒的舒姆斯基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进行猛烈攻击。当然卡冈诺维奇也对舒姆斯基进行了反

¹<http://rudocs.exdat.com/docs/index-412295.html?page=4>。按：1939年的人口调查记录，50岁以下的人中不识字者只有15%。见Под ред.Смолия В. А.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Москва,2008,с.658.

² Под ред.Смолия В. А.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Москва,2008,с.657.

³ 转引自Медведев Р. Расколота Украина.Москва,2007,с.100.

⁴ Аманжолова Д. А.,Кулешов С.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удьб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нэпа” .См.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Москва, 2002. с.58.

⁵ 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1917—1940. Москва, 1999, с.131.

驳。舒姆斯基宣布他再也不能在乌克兰工作了。¹另外，舒姆斯基在不同场合还多次要求从乌克兰召回卡冈诺维奇。比如早在1925年10月，斯大林在莫斯科与西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团会见时，舒姆斯基曾暗示应以乌克兰本族人取代卡冈诺维奇。斯大林认为这在原则上是需要的，但从政治角度来看为时过早。在1926年4月20日舒姆斯基又向斯大林提出撤换卡冈诺维奇的要求，建议以丘巴尔取代他。²而卡冈诺维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则对舒姆斯基提出了两个很危险的指控，一个是原“斗争派”成员聚会以联合反卡冈诺维奇的力量，这是要让斯大林明白卡冈诺维奇和舒姆斯基的冲突不是私人冲突，从冲突中可以看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想要建立政治反对派。二是在信后附上了从乌克兰作家赫维列维刚刚发表的抨击性文章中摘录的六页文字，指出舒姆斯基保护认为乌克兰文化应面向西欧而不是莫斯科的赫维列维，暗示这两个人最近的行为证明“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增强”，并要求斯大林写一封有自己对这一案例看法的短信。³

斯大林4月26日致信卡冈诺维奇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在承认舒姆斯基有一些正确的想法的同时，认为“决不能强迫俄罗斯工人群众放弃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化，而把乌克兰文化和语言认做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这是跟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原则抵触的。这不是民族自由，而是一种独特形式的民族压迫。”他谴责了舒姆斯基对赫维列维的保护。认为无产阶级的乌克兰化是个长期、自发、自然的进程。“企图从上面以强制无产阶级乌克兰化的办法来代替这个自发的过程，这就等于实行一种空想而有害的政策，这种政策会在乌克兰境内非乌克兰的无产阶级阶层中引起反乌克兰的沙文主义。”⁴斯大林的这封信实际上是支持卡冈诺维奇的乌克兰化方针。正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组织了批判教育人民委员的运动。斯克雷普尼克组织了对他的政治中伤，1927年2—3月的乌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指摘舒姆斯基的观点是“民族主义倾向”。他被解除人民委员一职并被调到俄罗斯的列宁格勒担任列宁格勒恩格斯国民经济学院院长。由斯克雷普尼克继任教育人民委员。

1928年，卡冈诺维奇被召回莫斯科提拔，柯秀尔接替他担任乌共总书记。柯秀尔是乌克兰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上任后同样致力于行政命令的方式，使用非法手段寻找所谓的民族主义倾向。1929年，揭发出了实际上不存在的敌对的“乌克兰解放联盟”。国家政治保安局认为叶夫列莫夫院士是其领导人，一些著名的乌克兰教授、作家、教师、职员是其成员。审理了“乌克兰民族中心”、“乌克兰民族党联盟”、“托洛茨基民族联盟”等司法案件。提出的指控归结起来就是已经成了公式化的表述方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1933年1月斯大林书记处的得力助手波斯蒂舍夫到乌克兰担任乌共（布）中央第二书记（实际上从1933年1月到1937年1月他履行的是第一书记的职责）。他一到任就开始对斯克雷普尼克施加压力，取消了斯克雷普尼克编订、各个大学都在讲授的民族政策必修教程的授课；在2月初举行的乌共中央全会上，波斯蒂舍夫间接地对他进行了尖锐批评。2月19日他的私人秘书被指控为反革命的乌克兰军事组织的成员而遭逮捕。1933年3月到5月，在乌克兰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官方文章。文章不提名地批评了与斯克雷普尼克相关的乌克兰化措施。在6月8—11日举行的乌共中央全会前夕，经乌共中央政治局许可《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杂志对斯克雷普尼克进行了公开的尖锐批评。在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克雷普尼克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没被接受。在全会后，乌克兰报刊对他的公开批评更加激烈。1933年7月7日斯克雷普尼克因无法忍受各方面的中伤而自杀身亡。由于是自杀，斯克雷普尼克这名老布尔什维克没有被定为反革命，仍被认为是杰出的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放松了自己的革命警惕，使得与反革命组织有关联的破坏分子占据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的显要位子。”⁵

¹ 详见*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292—293页。

²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294页。

³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295页。

⁴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7页。

⁵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473页。

1920年代末—1930年代乌克兰对乌克兰化政策拥护者及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打压，对乌克兰党和苏维埃机关民族干部的“清洗”，意味着乌克兰化政策的收缩。而这又是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分不开的。1930年代乌克兰化政策的收缩，是放弃新经济政策转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必然结果。正如一位研究乌克兰化的学者所说的：“从1932-1933年开始布尔什维克民族政策上发生的明显变化确实提供了说乌克兰化进程发生了根本转变的根据。全国的大环境（不仅仅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特有）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面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另一方面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因此继续讨好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力量是多余的（甚至对中央政权是有害的），在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条件下。斯大林要对乌克兰的农民进行全面监督，为此就不允许强化有民族情绪的知识分子在乌克兰农村的影响。与‘民族反革命’斗争实际上将后者置于‘无法律保障’的境地。”¹ 美国学者马丁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民族建设始终属于苏联政策的“软性路线”，当它不与党的“硬性路线”——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的任务相矛盾时，就会得到发展。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引发的中央集权化的加强导致了俄罗斯中央影响的加强，是全盘乌克兰化破产的主要原因。”²

不过，1930年代在“清洗”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民族干部”的同时，党和苏维埃领导人从来没有关于废除乌克兰化的任何正式声明。档案材料证明，在这段时期它仍是乌克兰领导人关心的问题。1934年3月，柯秀尔要求乌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国家机关乌克兰化的状况。乌克兰报刊上公开通告了将要进行的调查。1935年后政治局突然又转回到了提拔乌克兰族人担任领导职务的政策。1935年2月26日，乌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中央干部司下达了提拔乌克兰族干部的相关指示。1935年6月3日中央出台了决议，提出只能派乌克兰族人担任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职务的要求。组织局在自己的一些决议中要求推荐乌克兰族人担任高级领导职务。³在1937年5月27日—6月3日举行的乌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柯秀尔还说沿着十年前的那个方向“继续进一步乌克兰化的路线”。⁴乌克兰的历史文献中一般把1938年作为乌克兰化的结束年代，当时通过了两个著名决议：一个是《关于乌克兰语学校必须学习俄语》，另一个是《乌共(布)中央的俄语报纸〈苏维埃乌克兰〉与乌克兰语的〈共产党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处于平等地位》。此后开始了被有些学者称为“乌克兰化进程逐渐正常化”⁵的时期，苏维埃乌克兰仍是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并存。

结 论

如何更好地处理民族问题，这是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建设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就民族自身而言，每个民族都有保留自己的民族特征、保留民族多样性的愿望和要求，对这种要求应当尊重，发展民族文化（在苏联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文化）是合理的，但主要不应靠共和国行政机关的行为及经费，而是靠自由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群体来发展。对学校教学语言的选择也不应由民族共和国教育机关的指示确定，而是应由相应学区的居民民主意愿决定。同时，在统一的国家为了经济及其他要求，统一国家的中央政府机关可以尽力鼓励、但不是强制民族间交往的主要语言（在苏联就是俄语）的普及。以强制方式进行“本土化”、民族化，过分强化民族特征，会导致新的民族歧视和新的民族问题，不利于统一国家内民族共识的形成。从20世纪20年代苏联“本土化”

¹ Елена Борисёнок Феномен советской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1920—1930 годы) .见 http://www.nnre.ru/politika/fenomen_sovetskoi_ukranizacii_1920_1930_gody/index.php

² 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154页。

³ 详见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496--497页。

⁴ Борисёнок Е.Ю.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талинской диктатуры и поворот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на Украине(1930-е годы). См.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3,№1, с.168.

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3,№1, с.168.

政策在乌克兰的实践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民族政策上不能走极端，不能迷信行政力量，应该尊重各民族人民自己的选择。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不能按民族成分来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培养公民平等意识是十分重要的。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就是要完成由民族国家向公民国家的转化，就是要以建立在公民身份和权利的基本理念基础上的公民国家，取代建构在某一民族性之上的民族国家。苏联时期提出的“苏联人民”的概念本质上就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当今乌克兰所面临的也是一个把乌克兰建成一个建立在乌克兰族裔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的公民国家问题。

在当今乌克兰，乌克兰族人占绝大多数，俄罗斯族人属于乌克兰的少数民族。当今乌克兰搞的乌克兰化表明，曾反对俄罗斯化的乌克兰，在自己虽脱离了苏联而成为独立国家后，所用的还是苏联的行为方式。这种方式不但无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反而会引起很多新矛盾。认为“乌克兰如果还把俄语作为一种国语，乌克兰语就会消失，国家和乌克兰语会一同消失”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实际上俄语在乌克兰的国语地位根本不会影响乌克兰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哈萨克斯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乌克兰 75—80%的公民流利地掌握俄语，而哈萨克斯坦 85%居民视俄语为母语，俄语在那里第二国语。这并没妨碍它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相反，正如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的：“对后苏联地区的新国家来说，俄语的普及是个重要优势，它有助于这些国家在当今世界进行配套建设，与世界各国进行接触，掌握世界科学文化成果。”¹

【论 文】

十月革命前俄国自由派政党对俄国民族问题的认识

刘显忠²

十月革命前民族问题就是俄罗斯帝国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政府加强控制，进行俄罗斯化，往往导致各民族不满；放松控制，又导致分离主义倾向。对当时的民族问题，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各个政党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本文仅讲讲当时的自由主义政党和其思想家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及一些思想家对苏联的民族国家体制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没有得以实施，但它的很多内容还是切中了俄国及后来苏联民族问题的要害。在苏联时期得到了反映。

十月革命前俄国自由派政党对俄国民族问题的认识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自由派阵营，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是当时最大的两个自由派政党，当然还有一些从这两个党中分离出来的小党，如进步党、民主改革党和革新党等。我这里主要讲讲立宪民主党及十月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

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人同属于自由阵营。它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有很多相同的内容，它们都主张维护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主张实行地方自治而反对联邦制，主张民族文化自治，但

¹Медведев Р. Расколота Украина. Москва, 2007, с.111.

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研究员。

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存在分歧。

立宪民主党的前身是1904年成立的解放同盟。按研究俄国自由派的著名专家舍洛哈耶夫的说法，在解放同盟的纲领中也曾列入了民族自决的口号。这个要求还列入了1904年9月在巴黎举行的反对派和革命派政党会议上通过的纲领。在1905年革命事件的影响下，解放同盟的左翼考虑到吸引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站到自己一方来，不得不使自己的民族问题上的要求激进化。在1905年3月解放同盟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举行的同乌克兰知识分子代表的见面会期间，他们不反对联邦制国家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地方自治局自由派的压力下，解放同盟成员同意从纲领中删除联邦制条款，限定州自治权的要求，承认它作为例外的形式仅适用于波兰、立陶宛、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其他民族获得的只是“自由的文化自决”和在小学和地方机关中使用母语的权利。民族地区知识分子要求的激进化引起了俄国自由主义者的不安。1905年7月6—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人的代表主张在俄国实行联邦制。但会议搁置了对这个问题的审议。¹

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后，它既没提民族自决权，也不主张联邦制。其纲领主张在全国推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应当不分性别、信仰和民族按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而且，最高自治联盟的会议可以通过下级的自治联盟会议选举的方式产生。应当赋予省地方自治局加入临时和常设的联盟的权利。地方自治机关的管辖范围应当延伸到地方管理的各个领域，包括治安警察和教区，只有那些在当时国家生活条件下必须要集中在中央政权手里的那些管理部门除外，把现在纳入国家预算的资金的一部分赋予地方自治机关。中央权力机关的地方代表的活动应当归结为监督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的合法性，而且，对这方面出现的纠纷和疑义的最终解决应该属于司法机构。

在芬兰和波兰问题上，反对它们独立。对波兰，主张在建立了具有立宪权力的全帝国民代表机关后，立即在波兰王国实行有按全国代表机关选举规则选举产生的议会的自治制度。在保留国家统一的条件下按与帝国其他部分同样的原则参与中央代表机关。波兰王国和邻省之间的边界，根据当地居民的民族构成和愿望进行修正，而且，公民自由和民族文化自决权的全国保证在波兰王国也有效，在波兰王国少数民族的权利也应当受到保证。对于芬兰问题，主张恢复芬兰的宪法，保证芬兰的特殊国家地位。今后帝国和芬兰大公国共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当是帝国和芬兰大公国立法机关之间协商的事务。²

立宪民主党人在承认波兰和芬兰的自治权的同时，却是分离权的坚决反对者。如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民族问题专家Ф.Ф.科科什金，就坚持维护“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帝国的口号。他反对民族的政治自决和国家的联邦制原则，认为它是“具体的政策以外的东西”。在他的观念中，联邦制是肢解“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帝国”的直接途径。如1914年2月初，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在基辅与乌克兰的立宪民主党人商谈时，就警告自己的同事：“立宪民主党不仅反对在最近的将来实行联邦制的可能性，而且也将反对作为乌托邦的联邦制原则本身”。1914年2月19日米留可夫在第四届杜马中发表禁止举行舍甫琴柯纪念会的讲话，对乌克兰联邦—自治主义者指出，立宪民主党从来都不赞成联邦制的口号，它与联邦—自治主义者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党能同意的惟一一点就是承认这是乌克兰人在民族文化自治范围内的合法要求。³

而“十月十七日联盟”即十月党，就边疆和民族问题提出了“维护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和不可分割性”口号。这个口号就是主张“维持历史上形成的单一制的俄罗斯国家制度”，只承认芬兰享有特殊地位，在与帝国保持国家关系的条件下赋予它实行某种自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但是，

¹ Отв. ред. Шелохаев В.В.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4, 262—263.

² Шелохаев В.В.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России и эмиграции.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5, с. 95—96.

³ Отв. ред. Шелохаев В.В.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4, с. 271.

十月党人也主张在帝国内广泛地发展地方自治，承认某些民族都享有最广泛的满足和捍卫自己文化需要的权利，但也要在其他民族利益允许的国家思想的范围内。十月党人否定联邦制，同时他们也认为帝国的某些地方联合成地区联盟以便解决地方自治范围内的任务是完全可能的，这丝毫也不妨碍地方特点的发挥和不同民族表达和满足自己的立法和管理要求。¹

具体在波兰问题上，十月党人和进步党人不仅是赋予波兰政治独立权的反对者，甚至也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帝国内的自治权的反对者。进步党人主张通过赋予波兰人地方自治的方式解决波兰问题。立宪民主党人也持这种立场，立宪民主党人多尔戈鲁科夫在讲述立宪民主党人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时指出：“赐予波兰地方法案意义上的广泛自治权，让波兰广泛发展民族自我意识（完全的信仰自由、语言、学校）”。²这也表明了立宪民主党人与进步党人、左派十月党人的观点接近。

对乌克兰问题，自由主义者没有一致的意见。十月党人根本否认乌克兰问题的存在，甚至不把乌克兰人列入准备赋予在小学用母语教学权的那些民族的名单。进步派对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持略有不同的态度，主张在乌克兰发展地方自治机构，主张在小学推行乌克兰语，他们在理论上允许乌克兰自治的可能性，如果“这是人民的需要”。以司徒卢威为首的立宪民主党的右翼，认为乌克兰问题是“有害的知识分子的臆造”，呼吁对“乌克兰的分离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而以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列德尼茨基为首的自治-联邦联盟支持乌克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立宪民主党中央则更接近右翼的观点。³

关于犹太人问题，尽管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纲领中都要求所有俄罗斯公民不分性别、民族和信仰一律平等。但实际上，他们反对立即赋予犹太人平等的权利。这一点1905—1906年十月十七日同盟的右翼和它的西部分部和西南分部直接宣布了。至于党的中央，它主张所谓的逐步解决犹太问题，其内容归结为如下：1、赋予犹太人迁移自由，但保留各个地方的居民不允许犹太人进入的权利；2、犹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学和高校，但只能是在那里有空余位子的情况下；3、犹太人可以参加地方自治、私人社团和协会，但是某些方面的等等。只有不多的左翼十月党人主张立即赋予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⁴立宪民主党的右翼在犹太问题上与十月党人的观点相当接近。但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在六三体制下没有将犹太人问题提上日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出了必须使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问题。科科什金强调：“参加战斗的非俄罗斯人应当知道，他们是去保卫共同的祖国，祖国对他们而言不是别人的家，而是自己的家，那里有他们民族自由生活和发展的位子。受敌人入侵威胁的边区居民应当意识到自己是国家机体鲜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迫切的切身利益把它与中央联系在了一起。”⁵

一战期间，立宪民主党人在有关民族问题的杜马发言中，尽力都不超出进步联盟⁶的纲领范围，归结起来有如下四点：1) 解决俄波问题，即废除对俄罗斯全境波兰人权利的限制；立即制订并向立法机关提交波兰王国自治的法案，同时审议波兰土地所有制法；2、步入废除对犹太人权利限制的道路，尤其是进一步废除犹太人居住区，放松入学的准入条件，废除职业选择中的排

¹ Програм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России конца XIX—XX века.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1992. с.93—94.

² Отв. ред. Шелохаев В.В.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4, с.268.

³ Отв. ред. Шелохаев В.В.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4, с.271.

⁴ Отв. ред. Шелохаев В.В.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4, с.269.

⁵ Отв. ред. Шелохаев В.В.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4, с.272—273.

⁶ 进步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帝国第四届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代表党团的联合组织，成立于1915年8月，当时战争初期的爱国主义高涨为俄军春夏的撤退引起的恐慌所取代，人们指责政府无能。进步联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主要由议会中的各个政党：进步党、立宪民主党、十月党和“进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组成。进步联盟的主张主要包括：建立社会信任内阁，政府和立法机构协同行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改组地方行政机构的构成、减轻民族限制、部分地大赦政治犯、设立乡地方自治局、恢复被政府取缔的工会等。它的策略就是寻求与政权妥协，通过自由主义的改革来防止革命。二月革命后联盟的领导人进入临时政府。

挤，恢复犹太人的出版物；3、在芬兰问题上实行调解政策，尤其是改变行政部门和参议院的人员构成，停止对负责人的起诉；4、恢复小俄罗斯的出版物，立即对在押、流放的加利奇居民的案件进行重审，对其中受到迫害的那些人予以释放。¹

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帝国大国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民族独立的浪潮波及到各个民族地区，立宪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受到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立宪民主党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开始调整自己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在1917年5月的俄国立宪民主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听取了立宪民主党的民族问题专家Ф.Ф.科科什金（Кокошкин）的《自治与联邦》的报告。科科什金要求把“自治”问题与“民族问题”区分开，在分权制问题框架内研究“自治”。他认为在实行分权制的条件下单一民族的省和州实际上就变成了自治的省和州，而且也就规定了根据当地居民的要求可以改变边界、合并及分开。但科科什金所说的根本“不是一定要建立在民族区划基础上的自治，而是完全另一种类型的、纯区域的自治”。科科什金所要建立的自治“不是国家型的，而是有比较少的负责纯地方事务的管理机关的省型自治”。他主张这个事务范围只比地方自治机构略大一些。²他主张多民族国家最佳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是赋予各民族民族文化自治，而不是区域自治。代表大会按科科什金的报告精神对党纲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

对于语言问题，在1917年科科什金以中央的名义提交的决议中，对俄语和民族语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总的自由主义理论逻辑下，俄语不仅应当保有国语的地位，而且也应当保有民族间交际语言的地位，也就是发挥各民族间接近的一体化作用。在靠国家或地方管理机关供养的当地的国家和社会机关中，根据居民的民族构成确定使用当地语言的权利。同时应当在全国的法律制度上保证俄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赋予每个地方的居民用母语获得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的权利。

就是在立宪民主党内部，各派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立宪民主党的两位领袖人物彼·伯·司徒卢威就与巴·尼·米留可夫，早在立宪民主党成立前在民族问题上就存在严重分歧。司徒卢威公开鼓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口号。他主张把居住在俄罗斯帝国的民族分为“统治民族”和“非统治民族”。司徒卢威认为，俄国是“民族的俄罗斯国家”，而“俄罗斯族是统治民族”。司徒卢威宣扬“合理的”民族利己主义，认为“俄罗斯的领导权应当属于俄罗斯民族”。司徒卢威认为循序渐进的文化同化政策是“统治”民族发展和巩固的惟一途径。³Н.А.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С.Л.弗兰克、科特利亚列夫斯基、В.А.戈卢别夫等都同意司徒卢威的观点。”

4

而米留可夫则反对司徒卢威等人的极端的大国民族主义。米留可夫对民族主义的本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任何民族主义都倾向于民族独特性”，“有时可能采取极其荒谬的沙文主义情绪”，他强调，民族主义是维护历史基础和感化群众方式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的是使民众转移对“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任务”的关注。他认为大国民族主义最终要使自己对抗“1）发展和进步；2）民族平等（为了统治民族的利益，为了强占和征服）；3）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米留可夫将民族和国家组织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三种可能方案：“1）‘民族国家’——民族和国家一致，也就是说国家以单一的公民社会联盟为支柱；2）‘国家的民族’（瑞士、美国）；3）‘各个民族的国家’——以享有同样权利的各种民族联盟为支柱的国家组织（奥匈帝国）。”米留可夫认为，存在着两种把各民族联合成统一的国家的可能途径：首先是同化，其次是自由共处。米留可夫否定了迄今为止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获得成功，只能带来危害的同化政策，坚决主张各民

¹ Отв. ред. Шелохаев В.В.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4, с.273.

² Жданова И.А. Проблема федератив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17г. См.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7.с.25.

³ Отв. ред. Шелохаев В.В.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4, с.260.

⁴ 同上。

族在统一国家框架内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他强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俄国的国家组织的思想对抗民族的俄罗斯国家的思想。”根据这个观点，米留可夫认为，在“具有不同民族的国家”的框架内炫耀“民族的俄罗斯国家”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为这一口号实际上就意味着“统治”民族力求使“非统治”民族服从自己。他指出：“俄罗斯人不当统治民族，什么都不会失去，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他只会国家获胜的地方获胜。”所以，米留可夫认为，“国家民族”的思想只有在“各个民族的国家”中才能得到完全的实现。米留可夫原则上也不否认民族主义思想本身，但反对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¹

自由派政党的民族问题的主张的主要依据

俄国自由派政党反对在俄国过早地实行联邦制而主张自治，主要是为了维护“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这是基于世界经验和俄国现实的考量。这在立宪民主党民族问题、法律专家科科什金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科科什金通过对世界各国联邦制的研究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联邦制是建立在民族原则基础上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国家是按民族划分国家的组成部分的。他举了瑞士的例子，认为瑞士州的划分与民族的划分不一致。德意志族人是瑞士人数最多的民族，完全没有统一为一个整体，相反，被拆分为15或16个州。法兰西族人就人数来讲是第二大民族，被分成了5个州，只有意大利族人是瑞士联邦构成中人数最少的民族——由于历史原因被集中在提契诺州。各州的边界本身与民族边界不一致。在最大的州之一，在伯尔尼集中了两个最大的民族。这是一个部分是德意志族人，部分是法兰西族人的州。同样的情况在世界上存在的其他各个联邦中也存在：任何地方都没进行过民族划分。北美如此，依附于英国主权、有各种不同民族居住的那些联邦，也都是同样的情况。²

俄国的实际情况是实行民族联邦制的障碍。“实际上，阻止在俄国建立民族联邦，这首先是构成俄国组成部分的各民族人数的极端不均衡性，它们所占据的区域的不均衡性。联邦制所要求的如果不是组成部分的完全平等，那么，无论如何也应是具有可比较性、它们的大致相同的比重。而在按民族把俄国划分成各个组成部分时正好不具备这种条件。”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大俄罗斯人口大约8000万，乌克兰粗略的数字——2500—3000万，而后是一些中小民族，包括人数只有几十万人的最小的民族。³

这里首先出现了应当属于这个联邦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州的权限问题。这种权限或可能太过广泛，按国家自治的模式，或可能太小，按省级自治的模式。接受省级自治和联邦组成部分权限过小的标准，那么这种标准不可能适用于最大的民族。实际上，可以想象一下，让有2500—3000万人口的乌克兰——这个人口超过了西班牙、略逊于意大利巨大的政治实体——让这个就自己的规模而言是中等的欧洲国家，通过自己的中央机关从事那些属于省级自治领域的次要事务，让它解决有关道路、卫生事业、森林和湖海的保护的任何问题或负责其他经济文化生活问题。这种状况是很难想象的。当然，这也无论如何也不能令这样巨大的地区满意。此外，这种状况会导致在乌克兰境内，在这个政治实体的范围内建立极端的中央集权制。如果正相反，如果在联邦制范围内俄罗斯每个组成部分权限过大，大到与最大民族的体量一致，那么应当说，中央政权的权限就几乎化为乌有。⁴

若不平等地确定俄罗斯组成部分的权限，可以赋予大的民族广泛的自治权，而小民族较小的

¹ Отв. ред. Шелохаев В.В.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4, с.261—262.

² Кокошкин Ф.Ф. Избранное.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 2010, с. 479.

³ Кокошкин Ф.Ф. Избранное.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 2010, с. 480.

⁴ 详见 Кокошкин Ф.Ф. Избранное.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 2010, с. 481.

自治权，这样就会出现大民族将不依赖于其他民族独自在自家处理一系列最重要的事务；而小民族在自家将无法处理这些最重要的事务，小民族的这些最重要的事务应当由全国议会解决。而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可能还有其他大民族的代表将会参加全俄议会，在议会中形成多数，解决其他民族的那些事务，而这些大民族在解决自己的这些事务时不是在全国议会，而是在地方议会。这就会形成令人厌恶的大民族监管小民族的形式。¹

其次，联邦的划分问题。在民族联邦中，“大俄罗斯人将被按州进行划分，而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将组成完整的民族构成体，也就是说民族区域原则将在除俄罗斯人以外的所有各民族中推行。”这将引起最大民族的报复性反应和可能的冲突。“当提出民族独立、按民族原则改造俄罗斯的问题时，当民族作为有自己的要求和追求的政治单位被划分出来时，在大俄罗斯民族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捍卫某种形式的自己的民族利益的诉求，它将来将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民族利益也追求统一和独立，那么，到那时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他认为，“指出俄国按民族原则实行联邦制的必要性的那些民族希望事先在未来的俄罗斯国家大厦中为自己建一个符合他们要求的房间。它们的错误在于，它们没有充分地研究整座大厦的总体计划的实现条件。民族自治的拥护者没有提出按民族原则建立的联邦制俄国的确切的具体计划。”按民族原则划分俄国，在最好的情况下，从逻辑上看也不会导致联邦，不会导致联盟国家，不会导致德国人所称的“联邦国家”，而会导致各民族政治共处的其他形式——它导致的是所谓的国家联盟，导致的是邦联。它会导致俄国的瓦解，导致国家统一的破坏和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联盟的建立。²

反对在民族划分的基础上构建的自治和联邦的同时，他主张在俄国发展自治。他主张的不仅是地方自治，不仅是管理上的地方分权制，还必需立法上的分权制。因为当来自中央的全体会议进行立法时，按立法程序应满足俄罗斯各个组成部分一系列地方要求，那么对这些要求的满足确实没有牢固的保障。俄国由于它的庞大，不可能建立各种地方利益在其中都有足够代表的这样一种代表机关。在俄国一名代表代表 200 甚至 1000 多的居民。在选举时一部分居民不可避免地将完全没有代表，俄国的有些地方在这种最高国家议会中没有表决权，也就不能提出自己的地方需求，而在俄国有一些很小的地区，它们特别独立，强烈地要求立法者对它们特别关注。³

科科什金本质上是不反对联邦制的。而是主张在宪法生效后逐渐实行，以避免 1848 年革命中奥地利因民族纷争而使革命失败的后果。正如他自己在报告中所说的：“我的方案不是联邦制方案。我不主张联邦制不是因为我不支持它，相反，联邦制的俄罗斯共和国是我的理想，我认为，俄国应当走向这个目标。但我认为，实行联邦制要比只实行我说的这种自治复杂得多，立即转向联邦制会使共和国宪法本身的生效变得极端复杂。所以我提出了这一时刻要容易实现得多的东西，而且，这一制度，不符合确切的联邦制概念，因为享有自治权的那些地方联盟，在我看来应当拥有的不是国家的自治，而只是省级自治。”“但如果这里设计的制度不是联邦，那么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阶段，是与联邦制极为接近的一个阶段，如果我们踏上这个阶段，那么无疑，我们将会可能在可能不久的将来就出现把俄国变成联邦制共和国的下一步。”⁴

苏联的民族联邦制实践所遇到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正是科科什金所反对的民族联邦制，也使科科什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科科什金认为构成俄国组成部分的各民族人数的极端不均衡性、它们所占据的

¹ Кокошкин Ф.Ф.Избранное.М.: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ОССПЭН),2010,с.482—483.

² Кокошкин Ф.Ф.Избранное.М.: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ОССПЭН),2010,с.487.

³ Кокошкин Ф.Ф.Избранное.М.: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ОССПЭН),2010,с.490.

⁴ Кокошкин Ф.Ф.Избранное.М.: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ОССПЭН),2010,с.495.

区域的不均衡性、大俄罗斯民族的庞大人口数量是按民族原则构建民族联邦或俄罗斯自治制度的障碍之一。而苏联的民族联邦的实践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

在苏联刚成立时，俄罗斯联邦的面积占联盟的 90%，人口为联盟的 72%，当时中亚还都在俄罗斯联邦内。尽管后来中亚从俄罗斯联邦中分出建立了五个加盟共和国。但俄罗斯的面积仍占全联盟面积的 76%以上，比其他十四个加盟共和国的面积总和还大出了许多。人口占全联盟人口的 49%左右。它在苏联实际上处于一种很特别的地位。联盟机关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机关没有分离。在建立联盟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主席团、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的中央机关，从俄罗斯一级升为联盟一级。列宁 1923—1924 年、李可夫(А. И. Рыков)1924—1929 年是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两个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按俄罗斯学者的话说：“真正成为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央国家机关的继承者的不是加入联盟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苏联”¹。

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处于同等地位，但却没有像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有自己的科学院、有自己的共产党组织、没有自己的工会、共青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苏联的这些组织和机构既是联盟的，实际上也成了俄罗斯的。联盟机关对俄罗斯联邦独立性的侵蚀，使俄罗斯联邦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在国家及跨民族层面上代表俄罗斯人的是丧失了民族特征的党的领导人和联盟中央政府。尽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都是俄罗斯人占多数，在民族院中也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及其自治体拥有极大的人数上的优势：59 对 28²，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也占明显的多数，在联盟的科学院、党团组织中也都是俄罗斯人占多数。但这种联盟管理机关与俄罗斯联邦机关不分离的状况，一方面使其他加盟共和国始终对俄罗斯怀有恐惧；同时也并没有真正令俄罗斯满意。1949 年的列宁格勒案件，实际上就是俄罗斯不满这种状况的一次体现。根据一些资料来看，列宁格勒案件的参加者讨论建立俄罗斯共产党及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迁到列宁格勒，而且竭力要提高俄罗斯联邦的独立性。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也承认，列宁格勒案件使人看到的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迹象³。1956 年还提出了在西伯利亚建立俄罗斯联邦科学院的要求。1991 年俄罗斯率先甩包袱，实际上也与俄罗斯在苏联的特殊地位有关。以至于当今俄罗斯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人口最多的俄罗斯人在苏联恐怕是最无权的。”⁴实际上，关于联盟管理机关与俄罗斯联邦的管理机关分离，1923 年 2 月 21—24 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伏龙芝(М. В. Фрунзе)在《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的实际问题》报告中就一再强调⁵。但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

再有就是关于两院的组成问题及代表权的问题。在 1923 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如何组织第二院的问题时，导致了应当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高加索联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四个共和国的代表组成第二院，还是由不管是独立的还是自治的所有共和国及各民族地区的代表组成第二院的问题⁶。最后宪法中规定，民族院每一加盟及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选派代表 5 人，苏俄各自治省每省选派代表 1 人。民族院的全部人员须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⁷这就使俄罗斯的代表在人数上占了优势。

¹ Шейнис В.Л.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ССР и его перв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См.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2010,№1.с.79.

² Шейнис В.Л.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ССР и его перв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См.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2010,№1.с.78.

³ 《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 140 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46 页。

⁴ Под ред. Щагина Э.М., Лубкова А.В. Новейш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X-X век. Книга.1. Москва, 2004, с.408.

⁵ Ненароков А.П. Семьдесят лет назад: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а XII съезде РКП(б).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3,№.6,с.116.

⁶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 251 页。

⁷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12 页。

第三就是导致了俄罗斯人的问题。在1922年12月26日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联邦单位加入共和国联盟，而是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属的共和国分别加入共和国联盟，也许会更恰当些。实际上就是要以独立的俄罗斯共和国身份加入联盟。斯大林对此进行了反驳¹。1923年2月4日，斯大林在致全体中央委员的信中，又提出了是各个共和国通过现有的联邦组织加入联盟还是乌克兰、格鲁吉亚、突厥斯坦、巴什基尔等各个共和国单独加入联盟的问题。他阐述了自己对联邦原则的理解，指出：“单个的共和国（而不通过联邦构成体）加入毫无疑问是有一些好处：（1）这符合我们的独立及自治共和国的民族意图；（2）这可以取消联盟国家（联邦构成体）建设中的中间一级，取代三级（民族共和国—联邦构成体—联盟）而建立两极（民族共和国—联盟）。但这有一些严重缺陷：（1）比如这要拆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要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俄罗斯共和国，这要伴随重大的组织上的改造；（2）建立俄罗斯共和国，这就要迫使我们把俄罗斯族的居民从自治共和国的构成中分出来划入俄罗斯共和国。”²

在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姆季瓦尼再次提出把俄罗斯联邦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把各个组成部分变成独立的共和国，苏丹-加利耶夫说，“应当按姆季瓦尼的委托立即组建俄罗斯共和国。”斯大林不得不再次反对已有的自治共和国以加盟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苏联及为此而组建俄罗斯共和国的主张。他开导自己的论敌说：“同志们，着急不好。我们要观察一、二年，看情况如何，如果实践表明应当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分成小部分，我们就分，不必操之过急。”在斯大林看来这可能会加强大俄罗斯主义在国内的地位，他强调：“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³实际上，1925—1926年在党内还一直有关于建立俄罗斯共和国问题的争论⁴。

对民族联邦制的问题，在赫鲁晓夫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当时讨论宪法草案时，就有人建议取消在过时的民族原则基础上划分的共和国。建议用按经济区形成的共和国取而代之，把苏联划分成9至10个这样的地区：远东地区、西西伯利亚地区、乌拉尔地区、中亚地区、外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沿岸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中央地区和北部地区。⁵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又有些学者提出了改变俄罗斯联邦及其各个地区在苏联民族国家结构中的地位不平等性的问题。⁶1989年“萨哈罗夫宪法”草案中也有彻底改革民族国家制度，消除苏联的等级结构的要求。这种要求能否更好地解决民族问题，维持苏联的存在是另一个问题，但这说明了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苏联的民族国家结构存在问题。

¹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215页。

² *Ненароков А.П.* Семьдесят лет назад: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а XII съезде РКП(б).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 6, с. 115.

³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а перекрестке мнений. 20-е год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2, с. 211—213.

⁴ 详见 *Чеботарева В.Г.* И.В. Сталин и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кадр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8, № 7, с. 11—16.

⁵ (俄) 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著：《“解冻”的赫鲁晓夫》，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31页。

⁶ 详见 *Мякиев А.П.* Власть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Сове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1945—1991). Саратов, 2004, с. 265—266.

【论 文】

斯托雷平与俄国犹太问题¹

解国良²

对于俄国来说，犹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是随着叶卡捷琳娜二世瓜分波兰而产生的。犹太人进入俄罗斯帝国以后，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被划分为商人和市民阶层。只有少数人从事农业。犹太人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由于宗教原因，他们常常被看做经济的诈骗者和剥削者。³在1791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犹太人只能生活在俄国西部的波兰、波罗的海、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乌克兰、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15个省，建立起犹太人聚集区（черты оседлости）（英语国家叫做栅栏区），⁴不允许他们随便流动，居住、择业、当兵以及教育方面都受到限制。

随着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犹太人逐渐通过进工厂、参军拓展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特别是从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犹太人聚集区的界限有所松动。从1861年开始，有学位的犹太人可以在全国居住。从1865年开始，犹太的手艺人也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从1879年开始，受过高等和中等医学或者药理学教育的（产科医生、药剂师和牙医）的犹太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居住。⁵优秀的还可以进入地方自治局、市议会和法院从事社会活动。

自从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犹太人的活动重新受到了限制，并出现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最早的屠杀出现在1881年5月中，1884年甚至出现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博览会。1903年发生在比萨拉比亚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震动了国内外。除了死亡者之外，仅伤者就达到了300人，资金损失几百万卢布。参与大屠杀的除了市民、工人之外，还有官员。⁶俄国上下掀起了反犹太主义的浪潮。

反犹太主义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回响，它与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随着1905年革命和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给予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一样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成为宪法的规定。但在十月十七日宣言颁布的第二天，俄国就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据内务部的资料统计，屠杀波及64个城市、626个村镇和关厢地区，死亡810人，1170人受伤。⁷俄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举步维艰。斯托雷平坚决声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许诺在自己执政时期不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并为恢复犹太人的平等权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由于俄国人自上而下对犹太人存有的宗教偏见，改革成效不显著。研究这一问题的俄国学者闵德林认为，斯托雷平对犹太人的政策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相反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反犹太法律。⁸

资本主义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脱离集体依附走向自立的价值观的转变。作为没有完成这种转变的传统俄国人来说出现了转型阵痛，并在传统宗法派别的鼓动下嫁祸于先行启蒙的犹太人。斯托雷平认识到了俄国的落后性，试图通过渐进的改革削弱俄国的激进浪潮，对犹太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做出的。犹太政策最终成为非议斯托雷平的口实

¹ 本文刊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5期，第49-57转12页。

² 作者为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³ И.Барталь, И.Лурье, История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России. От разделов Польши до па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Litres, 2013, Т. 2, с.26.

⁴ Лев Сонин, От исхода до исх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евреев России.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2002, с.29.

⁵ Лев Сонин, От исхода до исх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евреев России. с.32.

⁶ Лев Сонин, От исхода до исх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евреев России. с.36-37.

⁷ Лев Сонин, От исхода до исх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евреев России. с.69.

⁸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Евре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олыпина. с.60. <http://litfile.net/web/283778/278000-279000>

之一。

一、革命条件下犹太问题的激化

1905年，俄国发生了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大多是激进的革命政党，如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在这些政党中担任领导人的多是犹太人。如参加第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8个人中有5人是犹太人；如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领导人8个人中有7人是犹太人。¹犹太人在俄国直接组建的政党——白俄罗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又称“崩德”，1905-1907年3年间有274个组织参加革命、人数达34,000人。²布罗夫斯基认为，犹太人参与革命，并不是简单反对俄国沙皇政府对犹太人采取的敌对政策，而是寻找探索真理的道路。³

革命的成果——立宪，便是探索真理的结果之一。然而，它带来的是1905年10月18-29日席卷俄罗斯市镇、乡村的犹太大屠杀。⁴屠杀是俄国民族主义者黑色百人团组织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与他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⁵黑色百人团提出一个最重要的理由，说：“俄国人民不想要宪法，它不同于西方的立宪主义；俄国人民除了专制制度外，不承认其他的执政形式。宪法是犹太人和他们的首脑维特伯爵杜撰的。应该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大学生、地方自治局、教师和办报人，到那时，俄国就安静了、平顺了，感谢上帝。”⁶

立宪并不是犹太人的杜撰，而是大改革以来自由派一直追求的结果。1904年11月6日，第二次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局部会议所做的结论说：“俄罗斯帝国所有公民的个人（公民和政治）权利应该平等；必须允许人民代表作为特殊的选举机关，参与实现国家政权、确立国家收支预算、监督行政合法运行。”⁷1904年担任内务部长的米尔斯基在11月24日写给沙皇的札记中说：“国家的社会发展超越了行政形式，所以必须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在国内实现合法性和广泛的容忍性，让人民参与立法工作。”⁸

在革命的压力下，1905年2月18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上谕说：“我打算从现在起，在上帝的帮助下，吸收最有价值的、人民信任的选民，在不动摇帝国基本法的条件下参与预先制定、讨论立法建议的工作。”⁹2月18日颁布的宣言说：“被骄傲冲昏头脑的蓄意谋反的领袖损害被东正教祝圣的、依法确立的俄罗斯国家根基，思谋中断与过去的自然联系，摧毁现有的国家制度，代之以建立与我们国家原则格格不入的新的国家管理制度。……我们必须提醒政府机关和各级权力机关履行服务义务和誓言，呼吁以高度的警惕性保护法律、秩序和安全。……牧师追求神圣、统治者掌管法院和真理、人民分享和平与安宁、法律获得力量和信仰，这是上帝为了我们全体忠实臣民的幸福，在俄国切实巩固真正专制制度的巨大成功。”¹⁰

从革命提出的要求——立宪，到宣言的颁布，俄国出现了对于政治制度的不同理解。虽然革命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二月十八日宣言变成了十月十七日宣言，核心条文也更有利于自由派主张，如：“（一）依据确保人身不受侵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诸原则，恩赐平

¹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М.: Яуза-пресс, 2010, с.329.

²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331.

³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327.

⁴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14, с.34.

⁵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35.

⁶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32.

⁷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12.

⁸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14.

⁹ Н.Д.Ерофее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последнем этапе своей истории(20 октября 1894 г.-3 марта 1917 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ИРИ РАН, 2014, с.54-55.

¹⁰ Н.Д.Ерофее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последнем этапе своей истории(20 октября 1894 г.-3 марта 1917 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52-53.

民以公民自由之坚实基础。(二)……尽量吸收迄今全无选举权之居民阶级参加杜马,然后依据新确立之立法制度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三)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民选机构得以确实参与监督朕所授予之权力行使是否合法。”¹但是,它无法改变沙皇赐宪法“制止前所未有之骚乱”的初衷。这样,革命的结果——宪政,就与米尔斯基所说的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产生歧义,也成为屠杀犹太人的根源。

宪政,对于犹太人来说是获得与俄国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对于俄国成员的犹太人来说无可厚非。如果这样的执政形式如自由派所说适合俄国现实的需要,那么俄国的保守派也没有必要攻击这种制度,并把它上升到犹太人杜撰的高度。显然,现实与人们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现实不会自动变成人们的认识,它需要启蒙。然而,俄国的情形如别尔嘉耶夫所说,“我们被黑暗所笼罩,我们被无意识的自发运动所统治。在黑暗中徘徊的不只是人民群众,还有广大的俄国知识分子。希冀给人民带来光明的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真正被启蒙、真正受教育、真正有文化,他们还处在半启蒙状态,他们的认识还处在启蒙的浅层。”²“半启蒙,无力揭示社会生活的客观理性和客观原则,它总是垂青于人的主观主义。”³于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革命的悲剧。

直到今天,俄国的民族主义者还这样认识犹太人。“当时,民族意识牢固的犹太人大多生活在俄国西部土地上并逐渐向俄国大城市渗透,他们有着绝对不同于俄罗斯文明的价值观。况且,由于民族发展的历史特点,许多犹太人更倾向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⁴“政府为了避免不同文明的对立,似乎划分了不同文明的界限(指犹太人聚集区的设立)。然而,大多数犹太人把这个举措视作对他们的反对,强化了他们意识中的反俄情绪。这种情绪使许多犹太人心理中千禧年的乌托邦日趋活跃,……强化了他们的宗教冒险主义以及对奇迹的追求。”⁵“如果对于已经失去了民族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还存在着善恶的基本界限,那么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约束俄国和俄国人民的那些界限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俄国对于他们,就如同印加帝国对于西班牙人,或者非洲对于英国人,是居住着愚昧人民的落后国家,必须用欧洲精神加以文明化。”⁶

这样,犹太人给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变化就成为犹太人消灭俄罗斯文明的举措。如犹太人投资工业变成了控制俄国的工业;犹太人向俄罗斯大中城市的移民变成了对俄罗斯的扩张;犹太人向俄罗斯人出售伏特加变成了对俄罗斯人民戒酒运动的反对;犹太人购买土地建立庄园变成了对无地农民的剥削;犹太人建立股份公司,邀请A. И.普梯洛夫、A. И.维什涅格拉德斯基、С. Ю.维特以及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玛利娅·费奥多罗夫娜参与,成了革命时期从容淡定的理由;自由派立宪、革命激进主义者发动世界革命是犹太人挑唆的结果;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犹太人学习好、考取中学大学的比例高,成为犹太教驱逐、根除基督教的理由,等等。以上诸点便成为俄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正当借口。

从实际情形来看犹太人给俄罗斯人带来的威胁,莫吉廖夫省长总结得比较到位。他说:“我做莫吉廖夫省长25年,当时犹太人在政治上非常可靠,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没有关于大屠杀的回忆。80年代发生的大屠杀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它们是犹太人剥削基督徒民众的结果;但是,此时的情形已经变得完全不同。现在,犹太人成了所有反政府运动的领导和主谋。事实上,他们中间也有其他信仰的人,但正是犹太人成为教唆者,而其他信仰的人成为被教唆的对象。”后来,他直接质问犹太人:“你们在不开化的人民中宣传不顺从,与政府斗争,但是俄罗斯的群

¹ (俄)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续集)——维特伯爵回忆》,张开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²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 1917-1918 гг. Изд. РХГИ, СПб., 1999, С.53.

³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 1917-1918 гг. С.54.

⁴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М.: Яуза, 2005, С.11.

⁵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С.11-12.

⁶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С.12.

众不想这样，起来反对你们，正是你们导致了这个结果。”¹

其实，资本主义并非某人的杜撰，而是客观发展的结果。犹太人处处占据了优势是他们宗教启蒙的结果。布罗夫斯基认为改革使得贵族和农民走向直接经营，打击了过去的承租人犹太人，才导致犹太人与俄国人的矛盾²，忽视了俄国人蒙昧或者半启蒙的作用。20世纪初莫斯科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П. А. 布雷什金说：“俄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盛行拜金主义……所有非商业阶层——贵族、官吏、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普遍轻视、嘲笑并有些瞧不起‘大财主’。”³德国学者桑巴特在《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中说：“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应该避免贪婪。他只是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看成用以取悦神的一种工具。用自己的全部财产并全部享乐作为达到这一目的之工具来取悦神，难道不是他此生的全部目的？实际上，获取财产身家并增进自身享乐……是一种责任，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成就神在地上之旨意的手段。”⁴

正是由于俄国人蒙昧或者半启蒙，才感觉俄国人的不行是犹太人“剥削”的结果。随着社会两级分化的加剧，特别是犹太人进入教育甚至政治领域，俄国人越来越感觉到国家在一步步沦丧，甚至出现了“犹太宗教是杀人宗教”的神话⁵。在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黑色百人团看来，1905年革命成为犹太人领导的对俄罗斯人屠杀的革命，十月十七日宣言给予犹太人以平等的权利势必引起激烈的犹太人大屠杀。一些不愿意参加革命的犹太人开始逃离俄国。如果从19世纪中叶开始，1870年以前，移居美国的有10,000-15,000人，1871-1880年达到41,000人，仅1882年就移民10,489人。20世纪初，犹太人每年从俄国移民15万到18万，到1914年移民总数达200万（在俄国的犹太人总数为500万人）。⁶虽然有观点认为俄国犹太人增长的比流亡的多，从1897年到1917年俄国的犹太人从500万增加到了725万，流亡美国的犹太人多是些最贫穷的小手艺人 and 仆人，⁷但是，俄国的犹太政策给美国人留下了迟钝、中世纪以及野兽一样的生硬印象。⁸

二、斯托雷平对犹太人的态度

斯托雷平就是在革命和反犹主义浪潮下开始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斯托雷平曾经在犹太人的聚居区科夫诺省、格罗德诺省当过首席贵族和省长，非常熟悉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并颇为欣赏。

1903年斯托雷平调任萨拉托夫省长以后，遭遇了农民起义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认识到萨拉托夫省的屠杀是宗法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冲突引发的，也希望通过改革农民土地使用方式解决冲突问题。他在对待屠杀问题上曾对自己的同事B. A. 斯克里皮岑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当然不允许屠杀。不要忘记，哪怕不满是有道理的，只要冲动，一俄尺的行为也会变得没有道理。不能让没有犯一点错误的人为犯错误的人受折磨。我知道所有私刑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就像开水因持续沸腾而溢出了碗边，蒸汽被无限加压不给应有出口而爆炸一样。我作为俄国人，忠于俄国的民族主义，但也正因为我是俄国人，才不能仇恨异族人、包括犹太人。因为这样做既违背我们的宗教，也违背俄国的人性。俄国人对待所有人都是善良、宽宏大量的，也善于与人相处。难道不是吗？”斯克里皮岑回答说：“正是。我们信奉爱与宽容，人民把罪犯也称为不幸的人，哪怕劳动所得一戈比都要塞给他。”⁹

¹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С.92-93.

²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242.

³ (俄) Б.Н.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页。

⁴ (德) 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安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6页。

⁵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280.

⁶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311-312.

⁷ Б.Г.Фёдоров, П.А. Столыпин.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637.

⁸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316.

⁹ В.А.Скрипицын, Богатырь мысли, слова и дела.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1, С. 4.

但是，斯托雷平对于社会骚乱的镇压遭到了革命者的误解，被当作默默支持黑色百人团的反犹主义者。他在1905年10月30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一小撮控制社会舆论的坏蛋什么也不干，只对人横加侮辱。当地的下流报刊，打着拯救城市的名义，指责我加入了黑色百人团组织。”¹

1906年4月26日，斯托雷平调任内务部长，有了直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机会。内务部从1902年就开始着手解决犹太人问题。1902年6月1日，内务部长B. K. 普列维组成特别会议，拟定重新审查“1882年5月3日犹太人临时规则”问题。1904年1月，特别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省长和高级官员，讨论1882年5月3日法律缺陷、思考变更犹太人法律限制还是取消犹太人法律限制。维尔省省长K. K. 巴伦伯爵提出在保留聚集区的情况下废除聚集区对犹太人的所有限制性法律。比萨拉比亚省长C. Д. 乌鲁索夫伯爵认为犹太人临时条例不仅没有给犹太人带来预期结果，也没有给俄国社会带来预期结果。然而，普列维认为特别会议具有“谋反性质”，²犹太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905年3月，犹太人在维尔诺召开了犹太活动家会议，成立“俄国犹太人争取完全平等权利联合会”。联合会内部分为左派激进派、自由派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尽管犹太自由派在其中占据优势，提出通过参选杜马解决犹太人的平等权利问题，但是，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第一届杜马提出的任何要求都遭遇了戈列梅金政府的沉默。³1906年5月4日，杜马阅读了关于“警察局直接参与鼓动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导致大部分和平居民被杀”的第一号紧急质询，要求内务部长回答他是否知道这个事实，采取了哪些措施制裁肇事者，未来准备如何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⁴5月8日，杜马就警察局印刷屠杀呼吁书并在沃洛格达（Вологда）、卡利亚辛（Калязин）和察里津（Царицин）发生屠杀犹太人事件紧急质询内务部长。6月8日内务部长斯托雷平回答紧急质询。首先，斯托雷平承认警察局特别部主任H.A. 马卡罗夫报告的宪兵军官卡米萨洛夫在警察局印刷传单并向维尔诺军人散发的事实，也承认宪兵军官布达科斯基骑兵大尉传播传单以及因军队力量不够利用自己的支持者镇压骚乱的事实，但是他认为这是警察局官员的个人行为。未来，内务部将采取严格措施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⁵关于沃洛格达等地方发生的屠杀事件，斯托雷平定性为骚乱，是社会组织所为。警察局派调查人员调查此事，结果遭到了社会组织的袭击。斯托雷平承认一些官员因形式主义和心地不善存在着违法行为，但是认为不能因此得出大多数官员不履行职责的结论。⁶斯托雷平知道此时的屠杀和非常状态有关，也知道国家为了恢复秩序实行的军事状态会造成冤案。但是他不认为这种状态是常态，也希望杜马帮助政府恢复秩序，加快改革。

闵德林依据警察局长A. A. 洛普欣向维特和斯托雷平汇报的真实情况定性斯托雷平的解释为托词。但曾任1903年基什尼奥夫屠犹后的比萨拉比亚省长，后任内务部副部长以及第一届杜马议员的乌鲁索夫认为，斯托雷平是真诚的。首先，在斯托雷平担任部长期间，谁也不敢利用内务部大厦和内务部的资金用于组织地下印刷所和屠杀。⁷其次，从处理屠犹事件来看，斯托雷平故意把部分官员参与反犹活动归结为官员的个人行为，撇清与政府的关系，是基于“政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⁸的考虑。无论是争取平等权利的犹太人委员会，还是反对犹太人的黑色百人团，如果把自己的观点带进政府，那么结果一定造成政府的软弱。如果政府软弱，社会就会骚乱，政府的规则就会遭到破坏。所以，斯托雷平在内务部的第一次登台亮相即把权力与规则区分开来，并提出利用手中过时的燧石火枪（指旧权力）履行自己神圣的义务——保持安静

¹ П.А.Столыпин, Переписка. М.: РОССПЭН, 2007, С.600.

² Б.Г. Фёдоров,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П.А.Столыпина. С.345-346.

³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48.

⁴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53-54.

⁵ П.А.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о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Полн.соб.рече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1906-1911 гг. М.: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91, С.35-37.

⁶ П.А.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о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39-40.

⁷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70.

⁸ П.А.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о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40.

与法律，保护劳动和生活的自由。¹

当社会渐渐走向安定之后，于1906年7月8日担任总理的斯托雷平即着手内部的改革。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改革，他说：“犹太问题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应该保持完全冷静的态度，服从这样的条件不是出于情感，而是出于政治和国家的必须。”²1906年7月15日，他就和温和派的右派社会活动家Д. Н.希波夫和Г. Е.李沃夫公爵商量，“为了让社会各阶级平静下来，需要在近期让每一个社会集团的迫切需要得到满足，以此把他们吸引到政府一边。”³据В. Н.科科夫采夫回忆，1906年10月初，斯托雷平召开大臣会议讨论机密性问题。会上，斯托雷平提议与会人员谈谈取消犹太人限制是否合适的问题。（取消注释）会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国家监察员П. X.什瓦涅巴赫和内务部副部长В. И.古尔科为代表，什瓦涅巴赫认为提出一个不太公正的要求是危险的，（取消注释）古尔科认为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地位是有害的；（取消注释）另一派以斯托雷平和财长科科夫采夫为代表，斯托雷平认为对犹太人过时的限制会引发犹太人的愤怒、革命和国内外的批评，也不会有任何好处，科科夫采夫同意取消限制是出于法国犹太人不给俄国贷款的现实需要。⁴经过投票，大臣会议的多数人赞成取消对犹太人的限制性法律并通过宪法基本法第87条予以实施。至于全面取消对犹太人的限制只有通过共同的立法程序才能解决。

1906年12月初，斯托雷平把草案提交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直到12月10日，大臣会议才收到沙皇的批示。但出乎斯托雷平意料的是沙皇拒绝批准该草案。沙皇在同时写给斯托雷平的信中说：“在收到你送来的犹太问题简报之前，我已经废寝忘食思考了很久。虽然有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正面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内在的声音越来越让我坚定地认为，我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直到现在我的良心从来没有欺骗过我，所以，这次我也要遵循它的吩咐。”⁵斯托雷平当天就给尼古拉二世回了信。斯托雷平从基本法的要求谈到社会的安定和法律的滥用，但从良心的角度直指尼古拉二世的便是这样一句话：“根本解决犹太问题是人民良心的事业”。⁶斯托雷平请求沙皇同意不要彻底放弃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而是提交杜马予以讨论。斯托雷平提出的理由是：“如果事情做这样一个回旋，最终在社会的眼里政府就不会失去陛下的信任，而现在对于陛下您来说，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⁷1906年12月11日回信表示同意，建议修改草案。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草案的第二部分不再是一稿的“通过基本法非常法的第87条予以实施”，而是“怀疑是应该通过基本法第87条颁布本法律草案，还是推迟到立法机关恢复工作时提交国家杜马以示对国家杜马的尊敬，请陛下裁决。”⁸12月15日，尼古拉二世在法律草案上批示“提交国家杜马审议”。

费多罗夫引用立宪民主党В. М.马克拉科夫回忆录的话说，尼古拉二世给斯托雷平信中提出的“内在的声音”其实是黑色百人团的声音，因为早在11月15日贵族联合会全权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В. М.普里什凯维奇就声明，联合会总委员会给自己的分会建议，请陛下不要批准法律草案。结果24小时之内，尼古拉二世就收到了205份要求拒绝法律草案的电报⁹。

此后关于取消犹太人过时的法律限制问题就再也不提了。第二届杜马没有专门提出有关犹太人平等法案，立宪民主党认为它是公民平等法案的一部分。当1907年3月12日，内务部长在政府宣言中提交的“关于废除现行法律中有关异教信仰和非斯拉夫族限制”的法律草案中竟不包括对犹太人的限制。¹⁰在第三届杜马，斯托雷平在叙述自己的执政宣言的时候，没有说一句关于取

¹ П.А.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о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41.

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142.

³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142.

⁴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145,143.

⁵ П.А.Столыпин, Переписка. С.22.

⁶ П.А.Столыпин, Переписка.С. 21.

⁷ П.А.Столыпин, Переписка.С. 21.

⁸ О пересмотр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ограничивающих права евреев. Геннадий Сидоровнин, П.А.Столыпин 1862-1911, Жизнь за отечество. М.: О-во сохранения лит. Наледея. 2014, С.691.

⁹ Б.Г. Фёдоров,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П.А.Столыпина. С.349.

¹⁰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173.

消犹太人限制的问题。关于解决犹太人的过时限制问题只是局部解决，如斯托雷平声明：“如果杜马提出关于犹太人的法律草案时，政府将向杜马改善聚集区内外的犹太穷人的生活 and 地位的态度上作出让步。”¹果真，在斯托雷平执政时期，犹太人聚集区之外再没有出现犹太穷人。

在斯托雷平执政时期，唯一有些变化的便是关于犹太人上学的额度。1887年6月1日和6月6日教育部出台的两项政策规定了犹太教信仰的居民大中学入学的比例。聚集区内，犹太教信仰的学生为学生总数的10%，首都为3%，其余地方为5%。1901年相应降低到7%、2%和3%。1903年恢复到1887年的状态。²由于这个规定在很多地方实际得不到遵守，各个大学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犹太教学生的录取比例，以填充基督徒留下的空缺。1907年托姆斯克的神父马卡里向沙皇反映此事，沙皇把信转交给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则根据实际情况在1908年8月19日恢复了1887年的学校录取比例，并在9月16日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批准。1909年6月，大臣会议通过决定，调整中学的录取比例，分别为15%、5%和10%。³

三、对斯托雷平犹太政策的定位

表面看来，斯托雷平时期执行的犹太政策不仅没有前进，而且出现了倒退。然而，从斯托雷平向沙皇提议取消犹太人限制，特别提出通过非常法方式实施的情形来看，他始终没有忘记解决犹太人的限制问题。这就为定位斯托雷平关于犹太人的态度设置了障碍。

就斯托雷平提议取消关于犹太人的限制，概括起来共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取消整个犹太人聚集区流动限制，允许他们居住在农村，扩大聚集区之外的犹太人居住地的选择权利，尤其是师傅和手艺人及其家庭成员（哥萨克地区除外）。第二，取消犹太人参加生产和销售酒精制品方面的限制，取消他们参与矿业以及其它行业的限制，取消犹太人占有租赁不动产方面的限制。第三，取消提示以前犹太信仰的要求，取消亲人追随流放者一起流放的禁令，取消对逃避兵役家庭的惩罚，缓和犹太人参与管理股份公司的限制。⁴

从法令的字面意义来看，这些限制都是非常一般的规定，为什么到了犹太人那里取消起来就这样艰难？难道犹太人真的长了三头六臂，一放出来就会把俄国人吃掉？难道犹太人真如俄国保守派、曾任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两任帝师以及圣主教公会总监的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和著名社会活动家、俄国犹太人大银行家М.Ф.莫里茨所说的那样，“由于千年的文化，他们无论在智力上还是精神上比仍然没有文化、愚昧的俄国人民都要厉害，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措施使得周围居民软弱的斗争能力变得平等起来？”⁵为此，必须逐条分析斯托雷平提出的解除犹太人的限制。

斯托雷平提出取消的第一条限制是允许犹太人居住在农村，允许其师傅和手工业者到聚集区外居住。有人认为，犹太人民只是由商人和经纪人组成的，没有劳动阶级，因为缺乏农民阶级这个占整个俄国多数的劳动阶级。⁶事实上，犹太人的这种局面是历史上形成的。他们居住在波兰的时候，由于波兰人擅长手工业，他们大多居住在农村和县城，依靠酿酒和租赁地主土地过活。当他们来到俄国以后，由于政府垄断酿酒业以及保护农民，他们又被迫迁居城市，登记为手工业者和市民，酿酒和租赁土地的营生受到了限制。工商业者的权利只是随着叶卡捷琳娜二世鼓励工商业而获得的，但是，通过1804年的条例，他们只能成为内地城里为商业而临时生存的人 and 行

¹ Л. Н. Нисселович,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III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Спб., 1908. С. 33 - 35.

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Евре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олыпина. с.60. <http://litfile.net/web/283778/278000-279000>

³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217.

⁴ О пересмотр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ограничивающих права евреев. Геннадий Сидоровнин, П.А.Столыпин 1862-1911, Жизнь за отечество. С.689-691.

⁵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264.

⁶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О Жизни евреев в России. Антисемизм в России. Изд. 2-е. М.: Книжный дом «ЛИБРОКОМ», 2012, С.46.

会手艺和艺术的完善者。¹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犹太人凭着自己的手艺成为不再有害于俄国的人，在 1865 年以后允许犹太人的机械师、酿酒师、厨师和一般的师傅和手工业者居住在帝国内，并在加入基尔特组织后享有这个行当所享有的好处和权利。但是，随着 1882 年临时条例的颁布，这些权利又丧失了，直到 1904 年。即便 1904 年有人在聚集区外登记为商人，也必须是成为一等商人 10 年以上和二等商人 5 年以上、没有刑事记录的人。如果商人不及时缴纳基尔特的费用，就必须返回购买不动产的聚集区内，否则流放。在聚集区外登记为商人者，一等商人及其仆人也只有在聚集区外停留 6 个月、二等商人停留 3 个月的权限。²至于从事农业的农民，是为了让犹太人占据新俄罗斯无人居住的土地。至于生活在城里和农村的犹太人，他们若享有所有权需要与定居点联系在一起。即便如此某些地方也丧失了购买所有权的权利，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财富。³

斯托雷平取消的第二条限制是允许犹太人经营酒精制品，允许经营包括矿业在内的其他行业，允许搞租赁。酿酒、售酒、搞租赁是犹太人的传统行业，在俄国人看来也是他们贫穷的理由⁴。于是从 1817 年开始，犹太人被禁止酿酒售酒，还有饮料。从 1845 年开始，连城外的饮品销售也被禁止。然而，实际上，俄国人根本离不开犹太人，作为临时措施，一些地主的酒馆可以租给包税的犹太人。到 1863 年，允许聚集区的犹太人从事饮品生意，允许租赁基辅、切尔尼戈夫、莫吉廖夫、波尔塔瓦、塔夫利达、赫尔松省的酿酒厂。与此同时，犹太人还可以租赁土地和各种农业设施。⁵虽然 1882 年，犹太人的酿酒售酒以及租赁权重新受到了限制，但是，犹太人的租赁业促进了行业的进步。如犹太人租赁土地之后，犹太富人投资农业，出现了农业专业化。铁路出现后，犹太人创造了最大的需求，他们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创造了 30% 的利润。犹太人刺激了地主和农民生产更多的粮食。他们把粮食用于出口，到 1897 年，西北边区犹太人占据了销售粮食的 88.6%。⁶除了土地和酒厂，犹太人的租赁业也逐渐进入了煤炭、石油与银行领域，出现了类似罗特施里德（Ротшильд）家族、根茨堡（Гинцбург）家族以及波利亚科夫（Поляков）家族等等。

斯托雷平取消的第三条限制是不允许以宗教为借口歧视犹太人以及惩罚逃避兵役的犹太人，适度放缓他们参与股份公司管理的限制。19 世纪是俄国犹太人出现新的手工业者阶级的时代。据 1897 年对犹太人的 1200 个居民点做的问卷调查表明，登记为手工业者的为 500,986 人，占以上居民点犹太人总数的 13.2%。通过某些数字可以得出结论：非犹太人的手工业者无论如何不会超过犹太人聚集区手工业者总数的 40%，或者将近 30 万，这相对于聚集区非犹太人总数 38,277,000 人来说，只占 0.8%，这样一来，犹太人从事手工劳动的人数是非犹太人手工劳动的 15 倍。⁷手工业工作对于犹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轻松的职业。例如，从事手工劳动的犹太人中锻工超过 16000 人，木工将近 12000 人，还有同样比例的砌炉工，更多的则充当石匠、瓦工和陶瓷工以及烧砖工。劳动时间长。独立手工业者的工作时间为 11-13 个小时，而家庭工业则达到 15-16 个小时，应季的工作时间长达 18 个小时。⁸由于犹太人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他们必须通过适应市场来调节自己，从而形成他们的特点。如他们的职业按照手艺分组，大部分工作都要求精细和精致的手艺，较之俄国人从事原材料加工来说，他们从事的都是接近成品的最后几道工序。⁹他们的主要职业主要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如食品行业、酿酒业、建筑业以及文化服务行业。¹⁰

¹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25.

²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27-28.

³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39-40.

⁴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32.

⁵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34.

⁶ Алена Ребель, История евреев в России, М.: Эксмо, 2013. С.118-120.

⁷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47.

⁸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52.

⁹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48.

他们的收入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西北经济最落后的地区，裁缝的年平均工资不足 250 卢布；而在地方经济福利水平最高的西南地区，其工资则达到了 300 卢布；在维斯瓦湾边区，33%的裁缝师傅的年平均工资不足 250 卢布，47%的裁缝工资徘徊在 250-300 卢布之间，剩下的裁缝才达到 400 卢布；在经济最发达的南部边区，裁缝的平均工资则徘徊于 250-400 卢布之间。

1

犹太人形成这样的特点不仅出于生存的经济原因，更出于他们的宗教原因。塔木德的文献指出，从事手工业可以抑制人们摆脱占有邻人财产的诱惑，同时也让人们不再具有无所事事生成的毛病。²对于俄国人，特别是愿意从宗教角度分析犹太人在租赁、银行业崛起原因的俄国人来说，不要老提醒犹太宗教对基督教的危害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正如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著名作家 B. B. 克利斯托夫斯基给《俄国通报》编辑 H. A. 柳比莫夫的信中所说：“犹太人正在走来。……在我们的眼里他正在征服世界。交易所、议会、报刊、律师界，在欧洲这些领域充斥着犹太人的代表，这些领域完全掌控在犹太人的手中。我们这里也遭受着同样的厄运，我们在为欧洲的这一小撮人支付着费用。在欧洲，犹太人是政治家、银行家、记者、工厂主、商人的样板，在我们这里，他以高利贷者和酒馆老板的优势成为直接影响农民、手工业者生产阶级的力量。”³克利斯托夫斯基继续说，犹太人正在合法地走来。但是，“犹太人对于我们更加危险是他开始禁锢了我们人民的生产力。……犹太人的特长就在于他是世界主义者，对于他来说，没有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才有的类似民族、国家荣誉、尊严、爱国主义等问题。犹太人到处都是，同时处处追求浑水摸鱼，这个浑水可以是交易所、报刊、军队饮食、议会，也可以是革命。不可能阻止犹太人的胜利进军，我再次重申的是‘欧洲的文明社会’缺乏应有的抑制力量，已经化身木屑的树干生长不出鲜活的苗裔，他已经成为注定失败的犹太人的牺牲品，因为他已经允许让自己大部分新鲜生命孕育附着在自己身体上的寄生虫。”⁴

克利斯托夫斯基的话讲出了具有极强民族荣誉感的俄国人的心声。但是，这是资本主义浪潮冲击下受伤害的自尊心的强烈反应，不具有任何建设性。俄国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参军以及参政的方法改变犹太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吸收犹太人参军不是出于犹太人公民义务的考虑，服兵役最主要的是应该成为‘教育’犹太人的手段，其中多半出于让他们加入基督教的想法。”⁵从政也同样如此。“1827 年，条例规定，犹太人服兵役只能担任低级军官，按规定退役之后获服役行为品评良好称号的人才能入民职担任行政职务。其他的犹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接收，直到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⁶1874 年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以后，新的兵役制度对犹太人没有特别的限制，但在 1876 年之后，这种平等的地位就遭到了破坏。首先服兵役的犹太人数明显多于基督徒。根据 1897 年人口数字，1902 年的犹太裔士兵应为军队总数的 4.13%，而实际则为 5.54%，1903 年为 5.56%。1902 年计划征招犹太裔新兵 17660 人，实际征兵 19705 人，多征了 2045 人，占新兵总数的 6.18%；1903 年计划征招犹太裔士兵 17855 人，实际征兵 19911 人，多征了 2056 人，占新兵总数的 6.2%。即便如此，政府根据 21 岁当兵条件，犹太裔新兵仍然缺员 1691 人和 1970 人。⁷其次，逃避当兵的犹太人接受的处罚，每人 300 卢布，逃避缴纳者由家长或者犹太人村社缴纳。⁸仍然是宗教因素的影响，犹太人在军队中担任军官以及在地方担任行政官员仍受到限制。尼古拉一世时期，只有在俄国高等院校获得博士学位的犹太人才担任官职，而且主要在医学领

¹⁰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49.

¹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50.

² Алена Ребель, История евреев в России, М.: Эксмо, 2013. С.122.

³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С.31.

⁴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С.32.

⁵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71.

⁶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87.

⁷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82-83.

⁸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77.

域。如果获得学位的犹太人仍然遵守犹太律法，无论如何不能在国家行政部门担任职务。到了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即使获得学位的犹太人也被关闭了供职行政部门的通道。¹

斯托雷平在给沙皇提交的解除犹太人常规限制的法律草案时，反复强调出于良心的考虑。他说：“特别强调的是，本草案拟定时严格遵循政府通告里直接指出的重新审查犹太人问题的那些界限。这里谈的不是全面解决犹太人的所有问题，因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不经过普遍的立法程序，也不可能不听从以人民选举的代表为首的人民良心的声音。”²通过分析斯托雷平提出的取消犹太人常规限制，说明斯托雷平已经直面现实了。然而，斯托雷平所遭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已经不是简单地发展生产力了，而是直接冲击俄国人的东正教价值观了。俄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给俄国带来的普遍的道德败坏和功利主义的确是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处理不好轻者破坏社会稳定，重者引发社会倒退。于是，斯托雷平把主要的经历用于发展柔弱农民，让他们经济独立，更让他们学会自治。至于在犹太人聚集的西部发达地区，实行了推迟多年的西部地方自治。虽然在行政建制和权力方面斯托雷平有意偏向弱小的俄罗斯人，但是西部地方自治的大发展不仅会激发犹太人等少数民族的能量，而且俄罗斯人也通过西部地方自治的发展向犹太人学会开发自己的生存本领，从而把社会引向正常发展的轨道。斯托雷平在西部地方自治问题上回避了民族不同，也回避了宗教信仰的不同，目的是把他们变成统一的俄国人，把经历用于建设上。

结 论

表面看来，犹太问题仅仅是斯托雷平改革中的一个小问题，但它却涉及了斯托雷平对资本主义发展给俄国造成的危机的态度。犹太问题是个世界性问题，但由于它触及到了人性中文化底蕴，不仅引发了人们对犹太人创造性成就的艳羡，而且引发了关于人性的哲学思考。受东正教的影响，俄国是一个非常虔诚地遵守宗教戒律的国家。正是这种虔诚以及为这个虔诚而引发的圣战造成社会的严重分裂：保守派成了绝对的道德家，而激进派则变成了极端的拜金主义者。斯托雷平对犹太问题的解决非常谨慎，尽量把它纳入到非常细小的日常生活领域，如允许他们在聚集区自由迁徙，允许他们从事酿酒业和租赁业，允许他们逐渐扩大在军界政界和文化教育界的权限。这样不仅可以淡化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宗教冲突，而且逐渐打开犹太人的封闭视野，融入俄国社会，转变俄罗斯人的“纯洁”的民族观念，自觉接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所以，斯托雷平关于犹太问题的解决如春风化雨，虽微弱但却侵入骨髓，悄悄改变着俄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32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¹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87-88.

² Геннадий Сидорович, П.А.Столыпин 1862-1911, Жизнь за отечество. С.688.